



《鸦片与中国100问》

- 一 中国人最早在什么时候接触鸦片的？
- 二 中国人在最早在什么时候开始种植罂粟的？
- 三 罂粟在中国是什么时候成为药品的？
- 四 罂粟从什么时候在民间受到广泛欢迎的？
- 五 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到罂粟的危害？
- 六 罂粟是如何从药品、保健食品演变为毒品的？
- 七 鸦片“吸食法”究竟是怎样在中国流行的？“吸食法”有哪些重要意义？
- 八 鸦片是怎样在印度盛行的？
- 九 最早是谁把印度的鸦片贩卖到中国的？
- 十 西班牙人在鸦片进入中国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 十一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是如何侵占印度的？
- 十二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是如何向中国贩卖鸦片的？
- 十三 什么是英国—印度—中国的“三角贸易”？
- 十四 “三角贸易”的结果是什么？
- 十五 鸦片是如何走私到中国的？
- 十六 美国人在肮脏的鸦片贸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 十七 清政府最早对鸦片泛滥采取了哪些措施？
- 十八 清政府在乾隆时期颁布了哪些法令？
- 十九 清政府在嘉庆时期颁布了哪些法令？
- 二十 清政府在道光时期颁布了哪些法令？
- 二十一 腐败的吏治是如何影响禁烟的？
- 二十二 中国的贩毒集团是如何见利忘义的？
- 二十三 外国鸦片商是如何破坏禁烟的？
- 二十四 鸦片泛滥后中国南方是什么状况？
- 二十五 鸦片泛滥后中国北方是什么状况？
- 二十六 是哪些因素促使了道光皇帝下令禁烟？
- 二十七 林则徐到达广州后采取了哪些禁烟措施？
- 二十八 什么是虎门销烟？
- 二十九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怎么爆发的？
- 三十 《南京条约》的内容是什么？
- 三十一 《南京条约》中为什么没有提到鸦片贸易？
- 三十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怎样爆发的？
- 三十三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怎样进行的？
- 三十四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鸦片政策是什么？
- 三十五 清政府对本地种植罂粟是什么态度？
- 三十六 罂粟种植为什么能迅速蔓延？
- 三十七 云南的罂粟种植是什么情况？
- 三十八 贵州的罂粟种植是什么情况？
- 三十九 四川的罂粟种植是什么情况？
- 四十 甘肃的罂粟种植是什么情况？
- 四十一 陕西的罂粟种植是什么情况？
- 四十二 山西的罂粟种植是什么情况？
- 四十三 其他省份的罂粟种植是什么情况？
- 四十四 鸦片国产化危害是什么？
- 四十五 鸦片国产化怎样破坏了中国的农业生产？
- 四十六 1949年以前鸦片在上海泛滥到什么程度？
- 四十七 1949年以前鸦片在山西泛滥到什么程度？
- 四十八 1949年以前鸦片在内蒙古泛滥到什么程度？
- 四十九 1949年以前鸦片在辽宁泛滥到什么程度？
- 五十 1949年以前鸦片在吉林泛滥到什么程度？

- 五十一 1949年以前鸦片在黑龙江泛滥到什么程度？
- 五十二 1949年以前鸦片在安徽泛滥到什么程度？
- 五十三 1949年以前鸦片在江苏泛滥到什么程度？
- 五十四 1949年以前鸦片在浙江泛滥到什么程度？
- 五十五 1949年以前鸦片在福建泛滥到什么程度？
- 五十六 1949年以前鸦片在湖北泛滥到什么程度？
- 五十七 1949年以前鸦片在湖南泛滥到什么程度？
- 五十八 1949年以前鸦片在广西泛滥到什么程度？
- 五十九 1949年以前鸦片在四川泛滥到什么程度？
- 六十 1949年以前鸦片在云南泛滥到什么程度？
- 六十一 1949年以前鸦片在甘肃泛滥到什么程度？
- 六十二 各地烟馆总体的特点及危害是什么？
- 六十三 甲午战争后到民国前中国有哪些禁烟呼声？
- 六十四 清末海外华人有哪些禁烟活动？
- 六十五 清末中国各地有哪些禁烟组织？
- 六十六 清末在华教会有哪些禁烟活动？
- 六十七 《禁烟章程十条》是怎么回事？
- 六十八 宣统时期有哪些禁烟措施？
- 六十九 清末各地是怎样禁种的？
- 七十 清末各地禁种的实际情况怎么样 清政府有哪些相应措施？
- 七十一 清末禁吸鸦片的措施有哪些？
- 七十二 清政府是如何禁止官员吸食鸦片的？
- 七十三 什么是《中英禁烟条约》？
- 七十四 《中英禁烟条约》的内容是什么？
- 七十五 上海万国禁烟会议是怎样召开的？
- 七十六 上海万国禁烟会议有哪些成果？
- 七十七 清末禁烟取得哪些成果？
- 七十八 清末禁烟有哪些不足与教训？
- 七十九 清末禁烟为什么没能根除鸦片？
- 八十 民国初期禁烟情况如何？
- 八十一 什么是民国初期的“四禁”？
- 八十二 民国初各地禁烟有哪些激烈措施？
- 八十三 孙中山先生对待鸦片是什么态度？
- 八十四 日本怎样开始对华贩毒的？
- 八十五 军阀混战时期中国的禁毒是什么情况？
- 八十六 各地军阀对鸦片是什么态度？
- 八十七 国民党政权初期的禁烟政策是什么？
- 八十八 国民党政府的“两年禁毒、六年禁烟”是怎么回事？
- 八十九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禁烟政策是什么？
- 九十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有哪些禁烟措施？
- 九十一 共产党早期的禁烟活动有哪些？
- 九十二 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禁烟政策、措施是什么？
- 九十三 解放战争期间我党有哪些禁毒政策、措施？
- 九十四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毒品泛滥的形势是怎样的？
- 九十五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有哪些政策措施禁毒？
- 九十六 新中国成立后的禁烟高潮在哪一年情况如何？
- 九十七 新中国成立初期毒灾最重的云南省是怎样禁毒成功的？
- 九十八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有没有毒品泛滥有什么政策法规？
- 九十九 改革开放后我国毒品泛滥的情况是怎样的 采取了哪些措施？
- 一百 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的性质与职能是什么？

一 中国人最早在什么时候接触鸦片的？

根据学者考证，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人最早接触鸦片是在唐朝。

最早的鸦片，是作为一种珍贵的药品，从中东地区流传到中国来的。当时，这种主要成份为鸦片的药品，还包括龙涎香、缩沙，肉豆寇、肉桂等名贵香料、药品，名字叫“底也伽”。现在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盛产“底也伽”。

唐朝的时候，中国与阿拉伯交往逐渐频繁。一些阿拉伯商人分陆海两途来到中国。陆路，就是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从中东来到唐朝的国都长安。水路，即经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广州、泉州、扬州等地。

在《旧唐书》上记载，“乾丰二年（公元667年）拂霖遣使献底也伽。”

“乾丰”是唐高宗（李治）的年号，时间是在唐初。“拂霖”，是伊斯兰语突厥文的译音，也称“大食”，属于东罗马帝国，其中心位置在今叙利亚一带。除了史书上的正式记载，《唐本草》上说底也伽的功能是主治恶客忤邪气心腹积聚，并且说它产自“西戎”。

由此可见，中国人最早的接触鸦片，是在唐朝的初年。当然，这种叫“底也伽”的东西，是作为一种药品进入中国的。



大唐长安



大唐长安太极殿复原图

二 中国人最早在什么时候开始种植罂粟的？

阿拉伯人从中东带来了含有鸦片成份的药品“底也伽”，也带来了提取鸦片的罂粟的种子。唐朝陈藏器所编著的《本草拾遗》中，有引用前人的话，说“罂粟花有四叶，红白色，上有浅红晕子，其囊型如箭头，中有细米。”

《本草拾遗》成书于“开元”29年，即公元741年，那么可以肯定，在此之前中国就已经有罂粟种植了。

罂粟花很美丽，唐代诗人雍陶在《西归斜谷》中吟道：

“行过险栈出褒斜，历尽平川似到家。万里愁容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

至少在唐代，中国人就已经开始种植罂粟了，但它是作为一种观赏植物被种植的。



三 罌粟在中国是什么时候成为药品的？

在唐代中国人开始种植罌粟，到了宋代种植就比较普遍了。人们逐渐认识、熟悉了这种植物，人们在欣赏它的美丽的同时，也逐渐发现了它的一些药用功能。

在杨世瀛的《直指方》、王璆的《百一选方》、王硕的《易简方》等医书里，都有用罌粟的壳治病的药方。寇宗奭在他编纂的《本草衍义》里面说：“罌粟米性寒，多食利二便动膀胱气，服食人研此水煮，加蜜作汤饮甚宜。”

杨世瀛的《直指方》里面说“粟壳治病，人皆薄之，固矣。然下痢日久，腹中无积痛，当止涩者，岂容不涩？不有此剂，何以对治乎？”

王硕的《易简方》中说：“粟壳治病如神，但性紧涩，多令呕逆，故人畏而不敢服。若用醋制，加以乌梅，则用得法矣。”

由此可见，在宋代，罌粟已经用来治病，尤其是治“痢”。同时还注意到它的一些副作用，并且有了减轻副作用的方法。



唐长安城俯视图

四 罌粟从什么时候在民间受到广泛欢迎的？

在宋代，随着罌粟的广泛种植及药用价值的被开掘，罌粟子逐渐受到百姓的欢迎。人们用罌粟子煮粥，以为有滋补的功效。刘翰(919~990)是宋代的翰林医官使，曾经治好过宋太宗的病，他所撰写的《开宝本草》里说：

“罌粟子一名米囊子，一名御米，其米主治丹石发动，不下饮食，和竹沥煮作粥，食极美。”

宋代大诗人苏轼曾经咏道：“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可见这时候罌粟已经成为一种美食了。

苏轼的弟弟苏辙在《种药苗诗》里面说得更详细：“罌小如粟，与麦皆种，与麦皆熟……研为牛乳，烹为佛粥。老人气衰，饮食无几，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锤石钵，煎以蜜水，利口便喉，调肺养胃……”

由此可见，罌粟在宋代就已经广泛受到欢迎，甚至作为一种保健食品被人们接受。



五 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到罂粟的危害？

可以说，从人们认识到罂粟的药用价值的同时就知道它的副作用了。从宋代医生对罂粟药用功能的叙述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人们对他副作用的阐述。如杨世瀛的《直指方》里面说“粟壳治病，人皆薄之”，如王硕的《易简方》中说：“粟壳治病如神，但性紧涩，多令呕逆，故人畏而不敢服”等等。

然而，对罂粟的毒副作用认识最深，并且提出警告的，该是元代的名医朱震亨。朱震亨字彦修（1281—1358年），他先习儒学，后改医道，在研习《素问》、《难经》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访求名医，受业于刘完素的再传弟子罗知悌，成为融诸家之长为一体的一代名医。

朱震亨指出：“今人虚劳咳嗽，多用粟壳止勤；湿热泄沥者，用之止涩。其止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

朱震亨说的“杀人如剑，宜深戒之”，应该是中国人对罂粟危害的最早的认识。



元代名医朱震亨

六 罂粟是如何从药品、保健食品演变为毒品的？

这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有两个关键点，即从罂粟提取鸦片技术的掌握及服用方法的变化。

在明代成化年间，中国人懂得并且掌握了从罂粟中提取鸦片的方法。明代曾经当过甘肃总督的王玺在他的《医林集要》里提到了罂粟提取鸦片的技术：“罂粟花花卸后三五日，午后于壳上用大针刺开外面青皮十余处，次日早津出，以竹刀刮在瓷器中，阴干，每用小豆大一粒……”

后来明朝的名医李挺在他的《医学入门》里面也提到：“鸦片一名阿芙蓉，即罂粟花未开时，用针刺十数孔，其津自出……”

从上面可以看出，尽管方法上有些出入，但提取的技术基本确定。从罂粟提取鸦片技术的完善，直接导致的就是鸦片药效的增强，同时也给普及提供了条件。比如著名的医学专家李时珍就在他的《本草纲目》里面提到：“（鸦片）能固丈夫精气”，因此“俗人房中术用之”。

在明代，鸦片已经成为一种能增强男性性功能的“春药”了。不仅民间流传，皇帝也沾染了这种嗜好。明宪宗与神宗都有对鸦片的依赖，1958年中国考古人员在定陵的发掘后发现，对明万历皇帝的头颅作了化验，发现有吗啡成份。

如同罂粟由海外传入的一样，吸食熟鸦片的方法也是由海外传入的。明朝末年，中国的东南沿海的某些地区，尤其是厦门、台湾等海外贸易较发达的地区，也开始使用吸食法享用鸦片毒了。到了乾隆年间，中国已流行竹管吸食鸦片，即烟枪吸食鸦片了。

既有了成熟的生产能力，又有了新的吸食方法，鸦片就从唐宋时期的稀有的药品及普及的美食、保健食品逐渐演变为毒品了。可以说这一过程的开端在明代，造成普遍的危害在清代初期。

七 鸦片“吸食法”究竟是怎样在中国流行的？“吸食法”有哪些重要意义？

据记载，在17世纪上半叶，东南亚热带地区的苏门答腊人首先发明了服食熟鸦片的方法。他们将提取的鸦片浆汁煮熟，再滤掉残渣，与烟草混和成丸，放在竹管里就火吸食，或者仅用熟鸦片制成丸子吸食。这种吸食方法很方便，又能品尝到鸦片烟的芬芳香味，很快就流传开了。到了明朝末年，中国的东南沿海的某些地区，尤其是厦门、台湾等海外贸易较发达的地区，也开始使用吸食法享用鸦片毒了。到了乾隆年间，中国已流行竹管吸食鸦片，即烟枪吸食鸦片了。

吸食法的流行，将鸦片由药用彻底推到了毒品的行列。首先，由于吸食法方便、易于仿行，使吸食者大大增加，全国每年消费的鸦片数量逐年增加。其次，用吸食法食用鸦片，使鸦片中的毒素更易深入人体，刺激大脑，产生自我麻醉、忘却烦恼、昏昏欲仙的感觉，加重了吸食者的成瘾性，从而更加离不开鸦片了。吸食法，使沉迷于其中的瘾君子充分领略了鸦片的“功用”，很快就形成了难以戒除的成瘾性，自身受到的毒害越发严重了。



吸食鸦片

八 鸦片是怎样在印度盛行的？

公元七世纪末，阿拉伯人进入了印度，并且把它划入了帝国的版图。在征服印度的过程中，阿拉伯人带去了罂粟与鸦片。

恒河流域土地肥沃雨量充沛，很适合罂粟生长，此后1100多年时间里，罂粟一直是印度的一种重要作物。自公元八世纪起，鸦片逐渐成为当地人普遍的嗜好。印度人抽鸦片有自己独特的方法：用两碗相合，底上穿孔，中间置鸦片及火，然后用一根长铁管插在孔中吸食。

由于有大量的需求，所以罂粟被广泛种植，罂粟甚至成了孟加拉一带的主要作物。印度政府对罂粟的种植与鸦片的贩卖征税，成了政府的一项重要收入。

九 最早是什么人把印度的鸦片贩卖到中国的？

是欧洲的葡萄牙人。1498年葡萄牙人进入印度，1510年占领果阿（GOA），翌年占领马六甲，还先后侵占了科伦坡、爪哇、加里曼丹等地，开始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

1513年葡萄牙商人首次抵达中国沿海，接着驻马六甲的葡萄牙省督两次派人来华，谋求建立贸易关系。1553年葡萄牙人进入澳门，到1557葡萄牙人收买明朝官员，盖屋赁地，将澳门窃取为“居留地”。此后，葡萄牙商人从印度收购鸦片到中国广州贩卖，这是印度鸦片大量流入中国的开始。



葡萄牙远洋帆船

十 西班牙人在鸦片进入中国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公元16世纪以后，西班牙逐渐强盛，步葡萄牙人后尘进入东方，1571年侵占了吕宋（今菲律宾）。1575年西班牙人派了两个传教士到达中国福建，此后又占领了中国台湾的鸡笼（基隆）与淡水。中国政府曾一度开放漳州、厦门作为西班牙的贸易口岸。

西班牙人在向东方的扩张中，把从美洲大陆带来的烟草传到了菲律宾。约在1620年前后，烟草从菲律宾传到福建，后又传到台湾。台湾当时丛林密布，疟疾流行，西班牙殖民者把烟草、鸦片与砒霜混合起来使用，作为对付恶劣环境与湿热疾病的药方。这种方法逐渐流行起来，先是中国厦门，然后传遍中国大陆各地。



西班牙远洋帆船

十一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是如何侵占印度的？

18世纪后叶，英国进行了工业革命，国力日益强大，1855年英国战胜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后加快了向外扩张的步伐。英国人1591年到达印度，1600年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后该公司与成立于1698的新英国东印度公司合并。它从英国女皇那里取得了“特许状”，可独占从好望角到东方这一广阔区域所有国家的贸易，并在所占领的殖民地拥有军政全权。

1707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利用各种手段，包括经济渗透、哄骗、欺诈、租赁、购买等等，逐步得到了孟买、麻德拉斯、加尔各答等重要据点。1786年英国人又占领了槟榔屿，1795年控制了马六甲，1811年又进入了爪哇。此后又成功地进入了暹罗与缅甸。



莫卧儿王朝的末代皇帝
穆罕默德·巴哈杜尔·沙

十二 英国东印度公司是如何向中国贩卖鸦片的？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侵占了印度之后，目标就对准了中国。

早在1715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商馆，并且定期派遣船只往返，进行小规模鸦片生意。他们从中国购买茶叶，卖给中国鸦片。1727年，英国向中国输入的鸦片达200箱，到了1729年，中国开始了禁烟，东印度公司的鸦片生意受到影响。

英国人最初是从中东、近东购买鸦片原料，加工后运到中国的。这种方式使英国人的利润受到影响。自1757年以后，英国控制了孟加拉，逐渐建立了鸦片的种植、加工基地，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管理也日渐完善。自1773年以后，从印度直接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模式就确定了。

1818年，英国控制了整个西印度，东印度公司垄断了鸦片生产与销售，向中国贩卖鸦片的规模逐渐加大。



英国东印度公司标记



当年的广州



英商怡和洋行1867年在天津设立分行



英商怡和洋行

十三 什么是英国—印度—中国的“三角贸易”？

所谓的“三角贸易”，也可以用棉制品—鸦片—茶叶来表达，即英国向印度输出棉制品，印度向中国输出鸦片，中国向英国输出茶叶。整个过程，基本控制在东印度公司手中。

英国工业革命后生产严重过剩，大量的棉制品向印度倾销。同时，英国对中国茶叶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每年需要花大量的白银从中国进口茶叶，但英国商品在中国没有市场。那么，打开中国市场的商品，就只有鸦片了。

在中英贸易中，过去是英国需要花大量的白银购买中国茶叶、瓷器，而英国的工业品却打不进中国市场，因此英国对华贸易出现了巨大的逆差。“三角贸易”形成以后，中国对英国的贸易出现了巨大的逆差。根据资料统计，19世纪30年代，中国每年外流的白银达到700—800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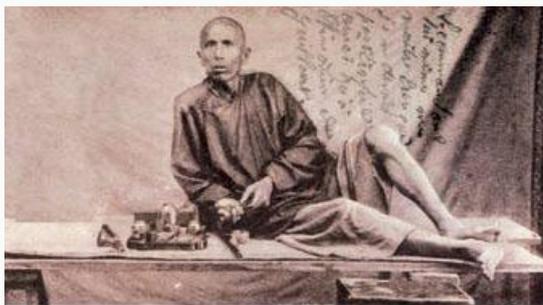
英国鸦片贩与中国听差

十四 “三角贸易”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首先是英国获得了极大的利益。英国政府分享了鸦片贸易的高额利润，英属印度政府按照鸦片成本300%以上的税率征税。同时，英国政府对东印度公司输入英国本土的茶叶征税，两项相加，每年就大约有500多万英磅。

印度的农民被强迫种植罂粟，虽然他们能获得一定报酬，但一方面农业遭到破坏，鸦片贸易获得的高额利润他们也不能分享。同时，英国的工业品还得以在印度倾销。

中国花了大量的白银进口毒品，不仅对外贸易出现巨大逆差，人民的健康更受到极大损害。同时，英国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的时候，正值中国的禁烟时期，鸦片的大量走私，腐蚀了中国沿海的官员，导致了大范围的腐败。



十五 鸦片是如何走私到中国的？

鸦片走私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鸦片贸易时期。在这一时期，东印度公司不直接出面进行走私贸易，他们将鸦片在印度拍卖，再由商人运到中国贩卖。这些往来于印度——中国之间的商人，既可能是英国商人，也可能是印度商人，习惯上被称为“港脚商人”（Country）。

这些商人使用港脚船向中国运送鸦片，这些港脚船在印度制造，多为英国商人出资，雇佣印度人当水手，船长由英国人担当。港脚船需要取得东印度公司的许可证后，才能进行对华鸦片贸易。

1834年，东印度公司在东方贸易的特权被取缔，对华贸易完全由私商进行，对中国的走私活动进入到第二阶段。

在这一阶段，对中国的鸦片走私有了大发展，规模空前。走私活动的特点为：

1，装备了新式的走私船。这种船名字叫“飞剪船”，比一般的帆船装载量大，速度快且不受印度洋季风影响。

2，创造了新的走私方式。一种叫“黄埔方式”，即英国商人将走私船停在广州的黄埔港，然后由中国人上船进行交易。还有一种叫“伶仃方式”，即英国走私船将鸦片卸在停泊在伶仃洋的趸船上，然后载着合法货物驶入黄埔港，在那里向中国买主提供鸦片样品，成交后中国商人到伶仃洋上的趸船上提货。

3，扩大了走私的交易点的范围，其区域从伶仃洋扩展到广州城外及东南沿海地带，如福建等地。

4，武装走私日益发展。为了抗拒中国缉私船的干涉，走私船上很多都装备武器，甚至有30吨的大型武装走私船，在1837年以后，鸦片走私已经又私下演变成公开强运了。



英国烟贩颠地



广州港是鸦片走私重镇



英国的“飞剪船”

十六 美国人在肮脏的鸦片贸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1784年8月美国的“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广州，两国开始了交往。根据统计，在1805—1844年两国间的贸易中，美国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逆差达39%。美国每年都要向中国运来大量的现银，才能维持贸易。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局面，美国人开始了向中国运送鸦片。

美国人向中国贩运鸦片与英国不同的是，一开始他们是从土耳其，后来从波斯购买鸦片贩运到中国的。在1805—1818年间，根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向中国贩卖了5000多箱鸦片。在1819—1827年间，由于英国印度鸦片的大量生产，价格降低，美国人的利润下降，贸易量减少。为此美国不断向英国施压，使英国于1821年允许美国商人贩运印度鸦片，美国对华的鸦片贸易开始增加。1828年—1838年间，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急剧上升，七年间美国向中国运送的鸦片已达7372箱。

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扭转了贸易逆差，节省了美国的硬通货。根据1857年出版的《美国国外贸易》的记录，1831年—1840年间，美国对华输出的现银比前10年减少了80%。根据统计与估算，美国通过对华鸦片贸易，从中国掠夺的财富大约在2000万银元。

美国的旗昌洋行是美商贩毒的中心，活动范围从广州逐渐扩展到东南沿海，甚至天津。



美国旗昌洋行

十七 清政府最早对鸦片泛滥采取了哪些措施？

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了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禁烟法令。该法令明确规定：不准销售贩卖，销售鸦片者，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从犯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兵役人等借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并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



雍正皇帝

十八 清政府在乾隆时期颁布了哪些法令？

在乾隆年间（1736—1796），朝廷再次重申对鸦片的严厉禁止：“国内商人贩卖者，枷一月，杖一百，遣边充戍卒三年。侍卫官吏犯者罢职，枷二月，杖一百，流三千里为奴。”（《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

这些法令，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鸦片的泛滥，但不久又逐渐废弛，没能阻挡住鸦片的进一步蔓延。



乾隆皇帝像

十九 清政府在嘉庆时期颁布了哪些法令？

1796年，由于进入中国鸦片的进一步增加，嘉庆皇帝根据两广总督的奏折，再次重申禁令，并裁去海关的鸦片税额，禁止鸦片进口。不久，又下令严禁种植罂粟。

1813年，颁布了严禁吸食鸦片的法令：侍卫官员买食鸦片烟者，革职枷号二月，军民人等杖一百枷号一个月，太监枷号两个月，发往黑龙江为奴。

这一法令，将惩罚的对象扩大到了吸食者。两年以后，又公布了查禁鸦片烟章程。由于广东等地方官员的努力，禁烟取得一定成效。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美国一艘贩运鸦片的船在广东被查获，嘉庆皇帝即下令将没收的鸦片全部销毁，并再次重申：“嗣后各夷倘再有私带鸦片烟泥者，进口之日，兵役等例严搜，一经搜出，除将烟泥焚毁沉溺外，必将私贩卖之人从重治罪，绝不宽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

嘉庆皇帝禁烟的决心很大，但由于国外走私商人的种种阻挠及中国官员的腐败，加之中国海关缉私能力有限，鸦片在中国泛滥的势头没能被阻止。



嘉庆皇帝像

二十 清政府在道光时期颁布了哪些法令？

道光皇帝继位后，继续延续嘉庆朝对鸦片的政策，推行禁烟。道光十一年（1831年），根据内地罂粟种植范围蔓延的趋势，颁布了严厉的禁种条例。条例规定：一，种植罂粟、生产鸦片者与贩卖者同罪；二，地保受贿与首犯同罪；三，所有种植的罂粟一律拔除，恢复其他农作物种植；四，各地官员需在春季到乡稽查；五，如果罂粟种植没能完全铲除，予以严惩。

同年，又颁布了更为严厉与详尽的禁吸条例：一，买食烟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二，职官买食者，加一等罪；三，内廷太监买食者，枷号两个月，改发各省给驻防官员兵丁为奴；四，失察之官员、海关监督等交部严办；五，各该督抚及道府州县官，出具属内并无买食鸦片烟之甘结，于年终汇奏一次，如徇隐不究，从严参处；六，制造及贩卖鸦片烟具者，分别治罪；七，同居子弟有买食者，除本犯照例惩办外，将家长照不能禁约子弟为窃之例治罪。



道光皇帝像

二十一 腐败的吏治是如何影响禁烟的？

大清王朝在经过“康乾盛世”之后，到了嘉庆时期已经由盛变衰，其主要标志就是官僚们已经趋于腐败。在嘉庆时期，很多官吏丧失了责任心与进取精神，这些人对工作敷衍塞责，欺上瞒下。在广东，一些官员不负责任，如1815年中国政府得到情报，说一艘名为利迪亚的帆船走私鸦片。中国官员们上船检查，只是看了看该船货仓上层的白糖、大米，就不再追究。

还有一些官员，因为官位是花钱买来的，所以他们任职后急于捞回“成本”，接受鸦片商人的贿赂。一些负责缉私的官兵，是最直接的受贿者。有人说，当时水师官兵的收入，只有十分之一来自月饷，其他大部分收入则是从鸦片商人那里接受贿赂所得。

鸦片交易是在中国政府指定的行商与外商之间进行的，行商所开设的就是洋货行，行商的职责是充当中国商人与外商之间的中介。这些行商带有官商性质，他们获得的巨额利润不能独占，就以各种方式，如“报效”、“捐输”等将部分利润转给皇帝、朝臣或地方官僚。因此鸦片交易额越大，各级官吏获利就越多。

一些地方高级官员或朝臣，通过下级的各种送礼、纳献等间接获利。甚至连皇帝也从鸦片交易中获利。

所有这些，使中国大量官员从上到下对鸦片交易采取了默许甚至支持的态度，导致了禁烟的失败。



腐败的官员们



大清官员

二十二 中国的贩毒集团是如何见利忘义的？

鸦片毒品从国外输入到中国由来已久，早在明朝末期就已经开始。输入的地点，以福建、广东为主。当地一些人受利益驱动，从毒品输入之日起就参与其间。鸦片交易历来有丰厚的利润，尽管走私有一定风险，可一旦成功则有十倍以上利润。

19世纪30年代，全国以贩卖鸦片为生的人数已经达到100万人。这些人分工不同，从到海洋中外商船上取货，运到岸上，到囤积、批发直到运往内地销售，形成了各种集团，并且形成各种帮派体系。这些不法分子贫富不一，有的是大贾巨商，有的贫困农民，为了利益纷纷铤而走险。



鸦片走私船



臭名昭著的鸦片贩卖“十三行”

在全国各地都有各级批发、零售商，各府、州、县都有烟馆，形成了庞大的网络，直接破坏了中国政府的禁烟政策，助长了国外鸦片对华出口，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

二十三 外国鸦片商是如何破坏禁烟的？

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外国商人，以英国人为主。这些鸦片商人，为获取更大利益，使用了各种手段。

1，为扩大鸦片销路而鼓吹“鸦片无害论”。

这些鸦片商人在《澳门新闻纸》上发表文章，举出一些“例证”，说在土耳其、英国都有很多人吸食鸦片，但对身体没有害处。他们将鸦片的危害与烈性酒比较，甚至说鸦片对人的危害要比酒小得多。

2，采用贿赂手法，用金钱买通中国官员。

3，武装走私。

美国羚羊号飞剪船从印度向中国贩运鸦片，当遭到中国官船拦截时，羚羊号向中国缉私船发起攻击，最终逃脱。羚羊号甚至曾经撞沉过中国缉私船，并把落水而死的中国水手悬挂在桅杆上。

4，武力威胁，保护走私。

1817年清政府命令外国鸦片商人订立不售鸦片的字据，东印度公司命令其下属船只予以拒绝。

1838年英国派军舰到广州示威，替鸦片贩撑腰。



1875年的广州水巷

二十四 鸦片泛滥后中国南方是什么状况？

1，广东：广州是毒品走私最严重的城市，也是毒品最早进入的城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州成为了鸦片的集散地。被称为“大窑口”的鸦片代理商，在广东各地已有几十家，每家的资本多达100余万，主要集中在虎门、澳门、黄埔一带。承包一个地区或者一县鸦片买卖的叫“小窑口”，已遍布广东各地，资本也有几十万。

除了这些贩卖者外，烟馆及销烟具的也到处都有。

2，福建：19世纪30年代以来，鸦片由水陆两途进入福建。水路鸦片船直达厦门、福州等地。陆路则由广东经过饶平、澄海进入福建，然后再转向福建其他地方。

3，浙江：浙江也是鸦片泛滥的重灾区，广东的毒品贩子将鸦片运抵台州、宁波等地。福建的毒品贩子则由蒲城、福鼎、寿宁将鸦片运抵浙江各地。

4，其他地区：广东的鸦片由梧州等地进入广西，由乐昌、连州流入湖广，由南雄等地流入江西。福建的鸦片由光泽、长汀转入江西，还有部分由江苏、上海沿长江进入湖北，汉口也成了鸦片的集散地。湖北的鸦片，还有部分进入了陕西。

整个南方，毒品已经泛滥成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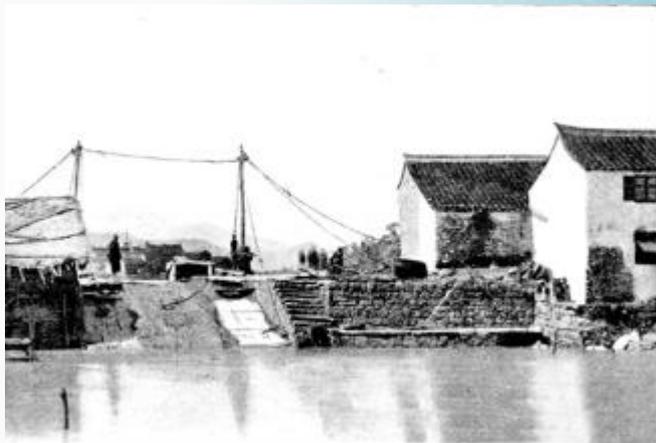
鸦片战争前的广州城外街景



旧时代的广州街景



汉口的洋行



运河旁边的江南民居



福州的外国租界



旧时代杭州西湖



宁波古城



旧时代的汉口



福建当地武官和护兵

二十五 鸦片泛滥后中国北方是什么状况？

1, 天津: 1832年, 大烟贩威廉·查顿派出满载鸦片的双桅船沿海成功航行到天津大沽口, 获利丰厚。以后, 查顿又以重金聘请传教士为翻译, 租船贩运鸦片到达上海和天津。天津最有名的鸦片囤积所有“潮义”、“大有”和“岭南栈房”等, 这些栈房还代办关税和转售鸦片。天津吸食鸦片的人也越来越多, 甚至出现了“烟馆处处有, 烟具陈列街前”的局面。(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

2, 东北: 1832年, 怡和洋行的鸦片船驶入辽东湾, 清《宣宗实录》里面记载它“行踪诡谲, 随处逗留, 殊为可恶”。奉天各海口如锦州的矢桥厂、营口、田庄台、盖平的连云岛等原来各地海船的停泊地, 成了东北鸦片的集中地。

鸦片贩子们还从陆路从天津经山海关、锦州等地进入盛京(今沈阳), 又进入吉林。

盛京(今沈阳)历来被清朝的满族统治者视为“根本重地”, 此地一向“风俗最为淳厚”。在鸦片水陆两途进攻下, 这里烟毒泛滥, 成了重灾区。

3, 北方各地: 北方各沿海城市, 几乎都遭到鸦片毒品的侵害。鸦片从山东登陆, 然后转销到河南, 并由潼关、太庆关进入陕西等地。山西也被毒品侵占, 太谷、介修等地有富商贩卖鸦片。鸦片烟具著名的“太谷灯”就出产在山西的太谷县。



奉天(沈阳)大南门



旧时代的太原街景



旧时代太原街景



奉天城(沈阳)大西门



旧时代天津的银行



旧时代天津的贫民窟

二十六 鸦片泛滥后中国北方是什么状况？

鸦片的输入量由道光即位之初的四千余箱，到道光十八年，即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已猛增到四万零二百箱。鸦片的泛滥，影响了民众的身心健康，吏治败坏导致中国白银外流，政府财政收入短绌。道光延续自雍正以来的禁烟政策，但鸦片走私不但不见收效，反而日益猖獗。事态的发展引起了朝野人士的警觉。道光下令封疆大臣讨论禁烟的看法，朝野对禁烟的看法不一，最终打动道光帝的是当时湖广总督林则徐的禁烟奏折。林则徐一针见血地指出：若再听由鸦片泛滥下去，则数十年之后中原再无可御敌之兵，也没有可以充饷之银。这种局面显然是道光帝无论如何也不想看到的，道光十八年十一月（1838）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



林则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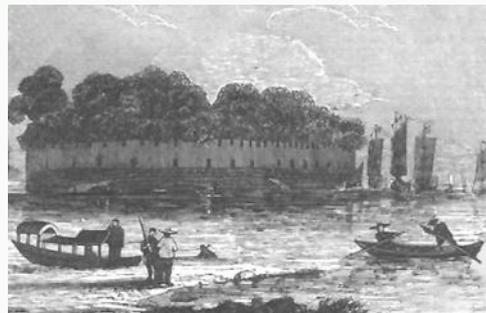
二十七 林则徐到达广州后采取了哪些禁烟措施？

道光十八年（1838），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并谕令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通力合作。次年三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后，立即进行了雷厉风行的禁烟活动。他在邓廷桢、怡良的支持下，下车伊始，即缉拿了17个据报在案的烟贩，调查了45名涉嫌从事鸦片交易活动的官府人员。之后，又下令所有吸食、贩卖鸦片之人，必须在两个月内交出鸦片和烟具，投案自新。到六月底，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林则徐共捕获鸦片贩子1700余名，收缴烟膏、烟土近65万两，烟枪7万余杆，成果较为显著。对于官员中涉嫌贩卖鸦片之人，林则徐也大力进行调查、惩处，先后惩办了广东水师副将韩肇庆及蒋大彪、徐广等下级军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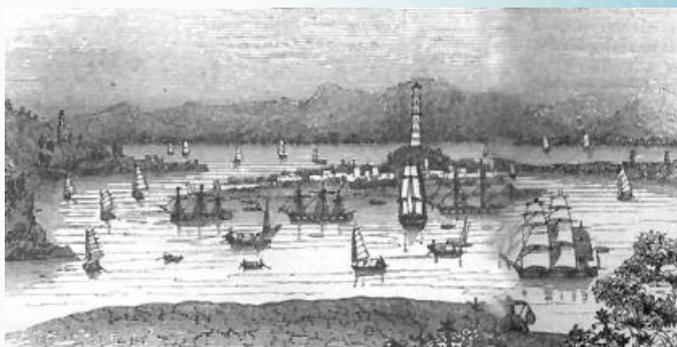
对于贩卖鸦片的外国人，林则徐也下了最后通牒，要求他们交出鸦片并保证不再贩卖。林则徐的谕令遭到外国鸦片贩子的抵制，林则徐采取了坚决的措施：下令封仓，停止中外贸易；派兵包围商馆，撤退商馆内的中国买办、工役，停止食物供应。至此，英国商务监督律以英国政府的名义，责令英国商人将鸦片全部交出，损失由英国政府和他本人负责赔偿。



巡视戒烟的清朝官员



鸦片战争前的珠江要塞



鸦片战争前的黄埔港

二十八 什么是虎门销烟？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命令将收缴的鸦片共计二万余箱，在虎门公开销毁。其时销毁鸦片，是在海岸处挖了若干池子，将鸦片、石灰放在一起，当海水涨潮时，鸦片、石灰、水发生化学反应，变成了灰烬，并被海水冲走，干净利落，一点残渣剩膏也未留下。

虎门销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禁毒行动，是正义战胜了邪恶的行动。然而，英国殖民主义者，却以此为借口发动了鸦片战争。



民族英雄林则徐

鸦片战争前后曾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义律



广东水师

二十九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怎么爆发的？

中国的禁烟措施，遭到英国政府的强烈反对。1840年夏，由四十八艘舰船和四千余名官兵组成的英国远征军封锁了广州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在林则徐的部署下，广州军民严阵以待。英军无隙可乘，遂北犯厦门，也未得逞。又进犯并攻陷浙江定海，继而又前往天津海口，将英国外交大臣的照会送交直隶总督琦善，琦善受命前往天津虎门口外的穿鼻，与英军统帅谈判，议定草约，称为《穿鼻草约》。中国割让香港，赔款六百万两，英国归还定海，两国国交平行等。清政府大为震怒，于是清政府于道光二十一年一月对英宣战，并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率兵赴广东作战。次月，英军攻占虎门炮台，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琦善被锁拿入京问罪。同年四月，广州城郊三元里发生民众自发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入侵的勇气。

同年夏秋，英军继续扩大战火，先后攻陷福建厦门，浙江定海，镇海和宁波。皇侄奕山奉命赴浙江主持军务，连遭挫败，逃至杭州。道光二十二年，英军攻陷吴淞口炮台，守将陈化成战死。之后，英军一度侵占上海，宝山，又闯入长江，攻陷镇江，切断京杭大运河南北交通，继而直抵江南重镇南京城下。同年七月二十四日，清政府在英军的炮口下，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战争场景

三十 《南京条约》的内容是什么？

这是清政府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它规定中国割让香港，赔偿二千一百万银元，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城市对外通商。此外英国还享有协议关税。而通过《南京条约》补充文件《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的签订得到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优惠国待遇和开设租界等特权。美国，法国随之也接踵而至，先后胁迫清朝政府与他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道光二十九年，葡萄牙驱逐中国在澳门的官吏，停付租金，公然强占了澳门。



1842年8月29日签订《中英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时中英战船交战时的情形

三十一 《南京条约》中为什么没有提到鸦片贸易？

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的条款中只字未提鸦片一事，似乎不可理解。其实，英国当局也知道从事鸦片贸易的邪恶性，英国民众强烈呼吁放弃鸦片贸易，因此，他们不敢公开要求鸦片贸易合法化。但是，鸦片贸易合法化，一直是英国奸商梦想。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鸦片贸易的邪恶的权力。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其实原则是鸦片贸易的继续。因此，在签订条约时，英国不敢将鸦片贸易合法化写进条款中，而是“劝说”清廷自动放弃禁烟。在谈判中，英方的中文秘书小马礼逊向钦差大臣耆英提出了鸦片纳税进口的要求，并诱劝说：清廷每箱鸦片征收关税50元，每年进口约6万箱，清廷便可得到300万元关税收入。英国首相巴麦尊也致函英方代表璞鼎查，再次强调：“为了保证两国间长久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把鸦片贸易放在某种正常、合法的基础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希望您利用一切有利机会，使用一切有力论点，使中国全权代表深刻认识到您的意见，用征税代替禁运，对中国有莫大的好处。”因此，璞鼎查极力申说，引诱耆英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但耆英老于世故，委婉予以拒绝：“鸦片弛禁之事，目前不便遽然奏请，各国商船是否携带鸦片，中国不必过问，亦勿庸绳之以法。”耆英的话表明：中国无意让鸦片贸易合法化，但对英国商船贸易鸦片也不查不禁，任其发展。这是战败者无可奈何的态度。

三十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怎样爆发的？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进一步发展，要求有更多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他们越来越不满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从中国掠夺到的权益，要求在《南京条约》的基础上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1854年和1856年，英、法、美曾两次以帮助镇压了太平天国为借口，向清政府提出包括中国全境开放、鸦片贸易合法化等无理要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随后，英法两国即策划了一场新的侵华战争，以武力来达到其罪恶的目的。这就是英法共同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国外交部大臣巴麦尊

三十三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怎样进行的？

法国以1856年2月法国神父马赖在广西西林从事非法活动被杀事件作为侵华借口。英国则急不可耐地制造了一个发动战争的借口——“亚罗号事件”。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走私船，曾经在香港领过一张登记证，已经过期。1856年10月，中国水师在广州附近登上亚罗号拘捕匪徒，遭到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的抗议。尽管两广总督叶名琛同意交还在亚罗号上被捕的中国水手，英方却不予理睬。10月下旬，英军突然发动进攻，占领广州以南沿江各炮台，并一度冲进广州城内。由于力量不够，1857年1月英军撤退，等待援军。

1857年9月，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统率海陆军来到香港。10月，法国全权代表葛罗也率兵到达。12月中旬，英法联军5000余人发动了对广州的进攻，29日占领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广东巡抚、广州将军等人投降敌人，在英法监视下组织了第一个地方傀儡政权。

1858年4月，英法舰队到达大沽口外海面。5月20日，联军发动进攻，大沽炮台在经过顽强抵抗后失陷。英法舰队随即溯白河（即海河）而上，到达天津。清政府慌作一团，立即派大学士桂良等赶往天津议和。在英法的威吓下，桂良于6月下旬分别与英、法签订了可耻的卖国条约——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1859年初，英、法政府分别任命普鲁斯和布尔布隆为驻华公使。6月中，英法公使率军舰到达大沽口外，拒绝清政府从北塘登陆的指定，蛮横地要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换约。6月25日，英法军舰向大沽炮台发动进攻。经过



1856年进攻虎门的英国军舰



广州一条繁华街道被英法联军焚毁



两广总督叶名琛（着袍服者）被英法军队押往关押地



法军在广州城门口的哨所

整顿的大沽守军奋起反击，击沉击伤英法兵舰十余艘，毙伤侵略军四、五百名。英法联军狼狈撤出大沽口。

1860年4月，英、法全权代表额尔金和葛罗率大批军队再度开到中国。5月下旬，英军占领大连湾。6月初，法军占烟台，完成了对渤海湾的封锁。8月1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21日攻陷大沽炮台，24日占领天津。清军退守张家湾、通州（今通县）一线。9月9日，联军向通州推进，21日在通州八里桥打败清军。次日，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10月初，联军占领圆明园，在恣意抢劫破坏之后，又放火焚烧，一座世界上最瑰丽多姿的宫苑杰作就这样毁于英法侵略军之手。13日，北京留守当局向英、法投降，交出安定门，联军兵不血刃控制了北京城。10月下旬，清政府代表、恭亲王奕欣与英、法代表先后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北京条约》规定：开天津为商埠；准许华工出国；割让九龙司地方给英国；发还天主教资产；对英、法赔款增加到800万两。



联军在广州城疯狂抢掠后，带着抢来的财物返回驻地



联军抓捕苦力，强迫拆毁民房



圆明园复原图



焚毁后的圆明园

三十四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鸦片政策是什么？

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列强的逼迫下，承认鸦片作为“洋药”而合法进口。但是，清政府对鸦片仍然采取抵制态度，并在一定范围内禁止吸食鸦片。

1863年，清廷曾颁布了一道圣谕，历述吸食鸦片的危害，进驻文武官员吸食鸦片。此后，有多次发布禁令。但由于毒品已经合法地大量地流入了中国各地，并且中国本地也普遍种植了罂粟，加工工艺也日趋完善，吸食鸦片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清政府的禁令名存实亡。

三十五 清政府对中国本地种植罂粟是什么态度？

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洋药”畅行全国，掠取了大量白银。这时的清朝廷禁烟政策已破产，已无法奢谈禁烟，便想方设法防止白银外流，提倡弛禁鸦片种植，以土抵洋的观点便又在朝野上下趁时而兴了。

一向以禁烟著称的林则徐，此时也赞同允许内地种植、生产鸦片。他所反对的只是吸食洋烟。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林则徐表示“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杨国桢：《林则徐传》第433页)

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1874)也奏请弛禁(种植土烟)，以抵制洋烟的涌入。他指出，“既不能禁英商之不贩洋烟，即不能禁华民之不食洋烟”，而禁止内地各省种烟，势必使洋烟四处贩卖，掠取厚利。因此，应“暂弛各省罂粟之禁，而加重洋药之税厘，使外洋烟土既无厚利，自不进口”，这样“不但夺洋商利权，并可增加税项”。如果外洋烟土不来，再严禁鸦片，也容易办到了。

李鸿章官高权重，所提出的主张又冠冕堂皇，似乎切实可行，因此影响很大，以至于弛禁(罂粟)的主张左右了政局，弛禁终于被清廷允许了。在弛禁的呼声和官员的默许、鼓励下，罂粟的种植迅速发展，全国各行省在都种植罂粟，清廷对土烟收税，但较洋烟税率为低，从而鼓励了土烟生产，光绪十一年(1885)，清廷规定洋烟每百斤收税银86两，而对土药征收60两。



直隶总督李鸿章

三十六 罂粟种植为什么能迅速蔓延？

同种植粮食等农作物相比，种植罂粟、生产鸦片的收益要高得多。受利益驱动，贫穷无靠的农民纷纷改种大烟。一时之间，全国各地，无论是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还是长城内外，漠北滇南，罂粟花到处开放，摇曳生姿。据记载，“自咸、同以后，烟禁已宽，各省种植罂粟者，连纤接畛，农家习以为故常，官吏亦以倍利也，而听之。”土烟生产的数量1866年约为5万箱，1870年已达到7万箱，已超过了进口洋烟的数量。至19世纪80年代，国产烟土的总量已是进口烟土的二至四倍。到了20世纪初，中国自己生产的鸦片又有很大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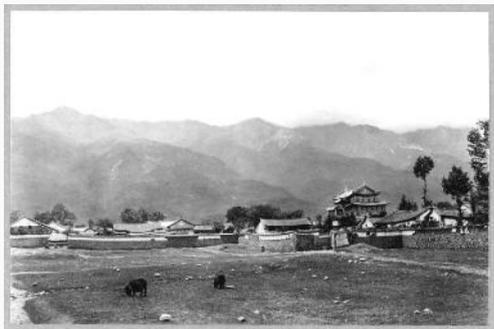
清末广东农民



吸食鸦片的农民

至19世纪80年代，国产烟土的总量已是进口烟土的二至四倍。到了20世纪初，中国自己生产的鸦片又有很大发展。

三十七 云南的罂粟种植是什么情况？



大理旧城

云南省鸦片种植有较长的历史，据传早在明末清初即由缅甸传入，并逐渐流传开来。在鸦片战争前的清朝道光十一年(1831)，云贵总督阮元、云南巡抚伊里布即联名上奏，指出了云南省种植鸦片的大致情况，奏章上指出：“滇省边隅，民风素本淳朴，而接壤越南，又近粤省，遂致有鸦片烟流入滇境，效尤吸食之事。而治边夷民，因地气燠暖，向种罂粟，收取花浆，煎膏售卖，名为芙蓉，以充鸦片，内地人民，以取罂粟子榨油为名，亦复栽种渔利。”

至光绪年间，罂粟的种植得到了很大发展，罂粟花到处盛开，姹紫嫣红，形成了一片“美丽”而邪恶的鸦片风光。光绪年间有人游历昆明，记录了昆明——云南省会城市郊区的鸦片罂粟种植情况：“出(昆明)南门，绕过金马碧鸡坊，过迎恩塘，时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全省的耕地，1875年约有三分之一用于种植鸦片，鸦片产量迅速扩大：1879年约为3.5万担，1896年约为8万担，1906年约为7.8万担。



云南乡村

三十八 贵州的罂粟种植是什么情况？

贵州省毗邻云南，但鸦片的种植时间稍晚。道光十一年(1831)贵州巡抚嵩溥奏：“黔山多田少，向无栽种熬烟之事。惟与滇、粤等省毗连，人民贸易往来，间有嗜食此烟者，奸商挟带，潜匿私卖，事所必有。”道光末年，广东商人将“广土”输入贵州，获利甚丰，当地人因而效尤，试种成功。咸丰、同治年间，贵州连续二十余年的战乱，广土来源断绝，贵州本地生产的黔土迅速发展，逐渐代替了广土。不仅如此，贵州所产的烟土以其较高品质反而输入广东，获取高额利润。这一高额利润，反过来又刺激了鸦片的生产，以至于全省各地广泛种植。当时，陈惟彦任职开州，他游历贵州各地，



清末农民

“约计所经州属，开垦之地半种洋烟”，罂粟的种植面积几乎占了农田面积的一半，当地农民把鸦片种植、生产当成重要农业生产活动，辛勤地劳作。“洋烟一物，为害实多，民不知非，视同禾稼，连阡越陌，手胼足胝，微利所归，群相竞取。”贵州省虽然地瘠民贫，但鸦片产量也相当惊人，1879年约为1万至1.5万担，1896年约为4万担，1906年约为4.8万担。



贵州妇女吸食鸦片

三十九 四川的罂粟种植是什么情况？

四川省的鸦片生产在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已经较普遍。四川简阳县，道光末年乡人竞相种植罂粟。广安州在咸丰末年开始种植，而至光绪年间已经遍地开花，鸦片成为该州农产品中的大宗。四川东部的苍溪县，咸丰、同治时罂粟的种植得到了快速发展，而至光绪年间川东已“无处不种罂粟”。到了清朝末期，整个四川，包括川东、川西南和川西北，都广泛种植罂粟，据宣统二年(1910)九月二十日《广益丛报》的记载，当时“川省百四十余州县，除边厅数处，几无一地不植鸦片者”。四川省的鸦片产量，1881年约为7500担，1879年约为17.7万担，1887年约为15万担，1896年约为12万担，1901年约为15万担，1906年约为23.8万担。四川省生产的鸦片数量增长很快，已经超过了云南省，成为全国鸦片产量最大的省份。



清末的四川

四十 甘肃的罂粟种植是什么情况？

甘肃省种植罂粟约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从同治年间陕甘总督杨昌与陶模为筹备军饷，先后奏请朝廷加征罂粟地稅的上疏来看，罂粟籽入甘后被种植，约在咸丰同治年间，即公元1851年至1862年。据1937年《民国日报》载，清咸丰时期，罂粟花满布于陕甘各县，产量日多，品质亦佳。《甘宁青史略正编》第27卷也说：“咸丰以后，鸦片由广东贩运入甘……吸者日多，种者亦日众，利厚工省又不择土之肥瘠。取液煮膏既谙其法，遂自吸食，而沿及妻孥，久之厮丐亦然，其倾家致死者不可屈指数。”1872年，有一德国人至甘肃，发现甘肃省鸦片大量输入东、西邻省，而未见其他地方输入的鸦片，这表明甘肃省已是一个产烟毒的大省。该年甘肃全省鸦片产量约为5000担，1896年产量约为1万担，1906年产量约为3.4万担。



甘肃的烟馆

四十一 陕西的罂粟种植是什么情况？

陕西省的鸦片生产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60年代以后有了大发展。光绪时山西巡抚曾国荃奏称：“自回匪(指陕甘回民暴动)削平以后，种烟者多。秦川八百里，渭水贯其中内，渭南地尤肥饶，近亦遍地罂粟。”当时，陕西关中的渭南、泾阳、凤翔，陕北的宜川、延川和陕南的汉中等县，已经成了陕西的著名鸦片产地。90年代以后，陕西的罂粟种植面积逐年扩大，遍及陕西全省。1906年，陕西约有53万余亩土地种植鸦片，约生产鸦片5万担。



清末的西安城

四十二 山西的罌粟种植是什么情况？

山西省鸦片种植、产量都很大。早在清朝同治年间，山西百姓即多以种植罌粟为业，开始时在山坡、地角栽种；获利后扩大至沃壤腴田，遍地种植。其时，全省罌粟栽种面积已达60余万亩；光绪时栽种面积进一步扩大，多达96万亩。（参见王金香：《近代山西烟祸》，《山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山西“通省百十有余属，几无处不种”，以至于干扰、排斥了粮食生产。光绪八年，山西巡抚张之洞将山西罌粟栽种情况上报，指出：“晋民好种罌粟，最盛者二十余厅州县，其余多少不等，几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余粟。”山西省土壤稍贫瘠，鸦片亩产量较低，1906年全省鸦片产量约为3万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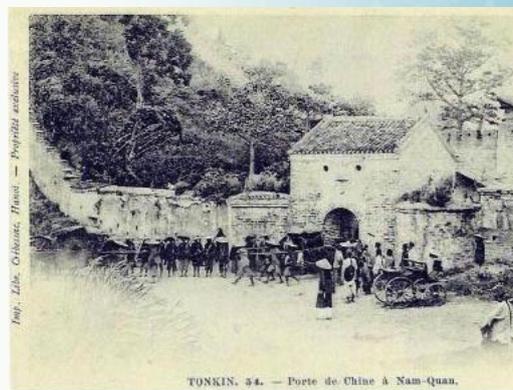
山西解池



陕西平阳隘道

四十三 其他省份的罌粟种植是什么情况？

其他各省也都大量地种植、加工制造鸦片。如1906年，直隶的鸦片产量约为1.2万石，河南的鸦片产量约为1.5万石，山东的鸦片产量约为1.8万担等，数量也很大。



清末广西镇南关

四十四 鸦片国产化的危害是什么？

鸦片国产化并不是一件好事。在晚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清廷在客观上不能抵制鸦片的大量输入，也不能、无法防止白银的大量外流，但通过允许栽种罌粟、生产制造鸦片，却成功地抵制了洋烟的大肆输入，较为有效地防止了白银的外流，减轻了风雨飘摇中的清廷的财政危机。从这一意义上说，鸦片国产化，对清廷是“有利”的。然而，鸦片的国产化导致了举国上下到处种植鸦片，使其产量迅速增加，价格大幅度下降，从而为更多的人，甚至更多的贫困百姓吸食鸦片提供了条件。因此，随着鸦片国产化的实现，整个中国的吸食者也迅速增加了，鸦片之害因而更加突出了。可以说，清廷实施的“以土抵洋”的鸦片政策，无疑是饮鸩止渴的政策，是以鸦片烟毒害更多百姓的涸泽而渔的政策，其危害相当大。

四十五 鸦片国产化怎样破坏了中国的农业生产？

据蒋狄明在《中国禁毒历程》一书的估算，1906年全国种植罂粟用地约为1871万亩，全国总耕地为125亿亩，罂粟种植面积占了1.5%，其中西南的云贵川罂粟种植面积较多，占了全部可耕地面积的8.69%。由于罂粟的种植，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开始减少，有些地区甚至为此引发了粮荒。如西北地区干旱少雨，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凡是有水灌条件的土地，往往种植罂粟，以取得较高收益。然后，再到附近地区购粮食用。这种情况的大规模发生，使西北地区粮食缺乏，极易造成粮荒。在同治三四年(1877~1878)间，北方发生了大旱灾，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直隶等地区草木枯死，粮食绝收，赤地千里，于是造成了北方地区的普遍缺乏粮食。饥饿的人们食尽了山上的草根树皮，再也没什么可吃的了，以至于饥饿而死。据估计，北方地区饿死的总人数超过了950万人。山西省灾情最重，饥民达五六百万人，饿死者超过了半数，有些村子所有的人全都饿死了，一个也没剩下。这一大灾难，虽是天灾，其实与罂粟种植大有关系。当时山西巡抚曾国荃曾指出：“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储渐耗，几无半岁之粮，猝遇凶荒，遂至无可措手。”（《曾文襄公奏议》卷八）但是，经历过此次大饥馑、大死亡，山西的罂粟种植面积并没有减少，照常种植，缺乏粮食储备的情形依然如故，光绪十九年(1893)再次发生大饥荒，死人盈野，惨不忍睹。

四十六 1949年以前鸦片在上海到泛滥什么程度？

自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开埠，迅速成为鸦片入口的中心，烟土大量涌入，烟毒遍地。据有关资料记载，清同治十一年(1872)上海有烟馆1700余家，诚所谓“上海烟馆甲天下”。当时，烟馆已成为上海的一景，有关文献对上海烟馆作了详细介绍。如陈无我在《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第10页《二十年前上海英租界烟间录》一文中，详细记述了一些著名烟馆：

“二十年前初到上海之人，咸谓上海有一奇事，即狂吸鸦片。人不能一日舍粟菽，上海则土店多于米店，烟馆多于饭馆。所有烟间，皆高大其室宇，精洁其器具，榻则镜石镶嵌也，灯则精铜雕镂也，斗则寿州购办也，烟则冷笼清陈也。抑且枪必择其老，扞必取夫钢，盘必择其洁，以及烟茶之供给、手巾之伺应。不特有瘾者趋之若鹜，即无嗜好之人，睹此一榻横陈，青灯有味，消磨岁月，呼吸烟霞，亦于此间得少佳趣，而忘其为伐性斧、腐肠药焉。当时英租界烟间最多，法租界、公共租界的烟馆亦复不少。而且



有名的烟馆多在法租界内。如当时最为著名的眠云阁，即设在法租界中，它的铺设精雅，烟具灯枪精巧无比。不仅如此，该烟馆首开使用女堂倌的先例，广招顾客。南诚信是法租界内的另一著名烟馆，以拥有烟榻数之多闻名上海。它有东西二厅，每厅设榻20余只，还有雅室，置一榻或二榻，四壁贴挂书画，多名人手迹。其中有一联，颇能传神：

“重帘不卷留香久，短笛无腔信口吹。”开设在麦家园一带的绮



园，以烟枪考究闻名，其烟枪有虬角象牙的，有广竹湘妃竹的，有甘蔗枸杞藤的，各式兼备，一枪之值高达百余金。还有一种大罗枪，更为名贵，以三千金易得。”

此外，闻名遐迩的烟馆还有北清芬、广诚信、老延龄、北诚信、五层楼、华众会、四海升平楼、四海论交楼、馨芳园、西园、绮云乐

心园、南北清芳堂、登楼万里春、寄园等，都是资本雄厚、设备考究、服务周到的上等烟馆。这些大烟馆，都布置得富丽堂皇，烟榻是雕花的大床，还有红木大床的，有桌子椅子，供烟客坐着聊天，并备有点心、茶果(有些烟果则免费提供)。烟具更是考究，烟灯烟杆和一切小零件都是用上等白铜制成，少数还有银制的；烟枪更是精制而名贵的，甚至有象牙制成的。有些烟馆有独到的熬膏技术，烟膏质量高，深受吸食者欢迎。上海烟土商李隆吉开设七家烟馆，其制膏水平高，以至于他本人获得了“烟灰金宝”的绰号。

对于大小烟馆，租界当局并不加以禁止。在法租界，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个海上闻人，勾结租界当局，实行烟土公卖，允许烟馆以公开或半公开的形式经营，但必须纳捐。规定，不论烟馆大小，都以烟枪的多少来交税，每支烟枪每天5元。如果一个烟馆有5支枪，那么每天必须交25元。由于法租界烟馆众多，烟枪更多达数万支，每天的收入相当可观了。为了更好地收取烟枪税，黄、杜、张又联合成立了枪捐公司，由杜月笙主其事，黄金荣负责与租界当局打交道，张啸林负责联系浙江军阀，处理与其他流氓组织的关系。枪捐公司成立后，仍执行上述枪捐政策，只按枪纳捐，对于烟膏销售多少概不过问。烟枪捐收入，除了法国巡捕房支取一部分外，其余并入烟土利润中，按烟土利润的分配办法，即大三股、中六股、小三股的方式分配。这种烟枪捐，大致从1923年起征收，到1927年北伐军攻占上海时止，历时三年多。黄、杜、张，在这三年中赚取了大量钱财。

此外，上海还有一种花烟间。如上所述，一些烟馆老板为招徕雇客，雇佣年轻漂亮的女性侍候烟客。花烟间又迈出一步，将妓女引进了烟馆，用妓女侍奉烟客过瘾。上海的花烟间集中在小东门，郑家木桥南首的兰芳里以及磨坊街、打狗桥等处。来此的瘾君子，一箭双雕，满足瘾、淫二欲。当时，有文人写诗形容说：“我爱时髦骚大姐，装烟递话最多情。”其实，此等烟馆是最低级的烟馆，烟膏质次，妓女也是久溺风尘的下等娼妓，为混口饭、混口烟而鬼混。

清末民初，开展了较为严厉的禁烟运动，公开的烟馆逐渐消失了，但其变种燕子窠却乘机而兴。燕子窠是一种低级烟馆，其得名，是因为燕子喜欢衔泥土筑巢穴，而瘾君子们也整天土不离口，奔波于寓所与烟馆之间，如燕子一般，故称其吸烟场所为燕子窠。在1927年前后，上海燕子窠盛极一时，仅法租界中就不少于6000余家；1928年，据中华国民拒毒会会刊《拒毒月刊》的记载，更多达8000余家。燕子窠设施简陋，有一至五套烟具，供瘾君子过瘾，其他则因陋就简，得过且过。燕子窠因系违法私设，不时有地痞流氓前去拔枪骚扰，勒索钱财。于是有流氓组成亚利公司，专门为燕子窠的烟枪保险。其保险方法为，每枝烟枪每天收保险费一、二角，如被查获，则由公司负责赔偿。至1927年1月底，该公司被查获，其已为一万七千余枝烟枪保险，赚取了大量保险费。(参见高洪兴：《抗战前的上海鸦片业》，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四十七 1949年以前鸦片在山西泛滥到什么程度？

山西是生产烟土的大省，全省城乡到处都有烟馆。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山西时，推行毒化政策，烟馆更是遍布城乡和工矿区，仅太原市就有烟馆20余家。每家烟馆每年销售大量烟膏，如“兴亚楼”烟馆，一年销售1万多两的烟膏。

在大烟馆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烟馆设置一排排短床，床上放着一个高枕，一盏烟灯，吸烟者一个挨一个躺在那里吞烟吐雾。有些烟馆，还雇请年轻女子侍候，陪同烟客吸食，几类似于上海的花烟间。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鼓励下，太原的大烟馆开业，都明目张胆地在《山西新民报》上刊登广告。武直刚在《鸦片对山西人民的毒害》一文中列举了六个大烟馆(当地称为土膏店)的广告：

“会仙土膏店开幕启事

择于阳历九月十九日开幕。本店开设麻市街西四十三号，房屋洁亮，宽茶阔役，招待周到。价钱格外克己，货质保君满意。各界惠顾，诸君盍兴来乎！”

“东聚兴土膏店开幕启事

本号开设太原市西肖墙街十二号。

专购上等原浆，净货细煮。福寿烟膏，清凉芬芳，与众不同。特设雅座，专备女客消遣。招待周到，保君满意。兹定于十月十四日正式开幕，务请先临一试，方知言之不谬也。”

从上述广告来看，大烟馆的主人为了赚钱，真是丧尽了天良，恬不知耻，竟然公开地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尤其是刊登以女色招徕雇客的广告。这真是无耻之尤！

大同的烟馆，在日本人督促下，纷纷增加床位和烟具等设备。烟馆设备以鼓楼西的一处最为完善。该烟馆租赁聚宝源饭店为营业场所，有10余间房屋，单间开设雅座，备有精制的吸烟器具，专供上层人士使用；另有大房一处，名曰“混堂”，烟具和设备远逊于雅间，供下层烟民使用。顾客一入门，即有招待员殷勤接待，先让座位，再选择鸦片的品种数量，然后开灯吸食。除茶水方便外，还备有瓜果、糕点，可随意选食。

四十八 1949年以前鸦片在内蒙古泛滥到什么程度？

民国初年绥远地区城镇普遍开设烟馆，“清水净烟”的招牌触目皆是，

烟馆大门两旁贴着醒目的对联：“去病增寿饭后一袋烟，守灯静养胜做活神仙。”

日寇占领绥远以后，烟馆更多，而且雇用青年妇女招待，诱人抽吸。这些青年妇女陪烟客围灯

横卧，并头对吸，烧烟侍茶；或兼事卖淫，满足烟民色欲。



东门

呼和浩特旧城东门



蒙古王公

四十九 1949年以前鸦片在辽宁泛滥到什么程度？

在日寇占领下，辽宁各地烟馆林立，也有咖啡馆存在。由于经济状况不同，存在着富人吸大烟，采煤工人、小商贩扎吗啡、抽白面的情况。抚顺千金寨比较有名的大烟馆有别有天、雅聚轩、新桃园、登仙阁、小瀛洲等，新站欢乐园一带则有广发成、永感楼等。这些豪华烟馆设备华丽，还备有花枝招展的女招待，公开接待烟客。她们一面陪同烟客，面对面地躺卧在烟榻之上，为烟客“打大烟”，侍候“瘾君子”；一面说说笑笑，勾勾搭搭，甚至发生色情行为。在这些烟馆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抽口大烟玩玩票，花烟馆里去买俏。”



奉天（沈阳）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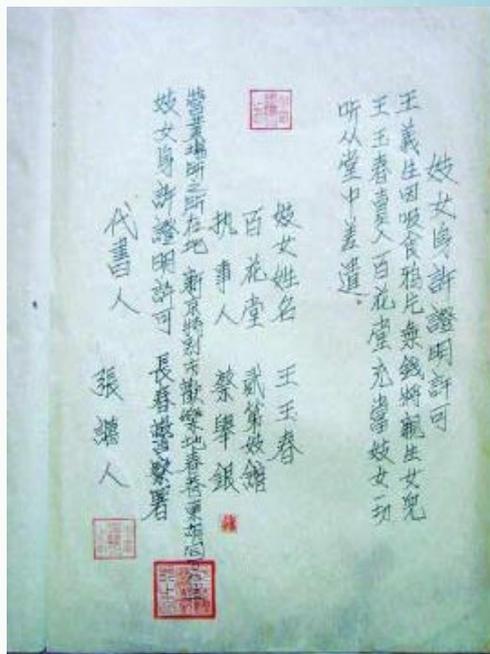
五十 1949年以前鸦片在吉林泛滥到什么程度？

在日本和伪满政权的统治下，吉林烟毒泛滥，各县都设立鸦片零卖所，其实就是大烟馆。1933年至1934年，开通县城仅13000余人口，即有庆丰恒、诚记、玉兴和、兴顺盛、厚记5个鸦片零卖所。每个鸦片零卖所内，都设有是容两人的抽烟单间，床上铺着厚厚的垫子。一般鸦片零卖所有10余间单间，诚记、玉兴和等大的鸦片零卖所多达20余个单间。每个鸦片零卖所都有管烟、看灯的人，负责售烟、倒水等服务。在这些鸦片零卖所内，还备有打扮妖艳的女招待，为烟客烧大烟，兼作色情服务。这些鸦片零卖所以色、烟二欲，引诱了不少顾客，以至于抢了当地青楼生意，窑娼的“花界会”为此多次提出抗议，要求取消女招待。

此外，还有私烟馆和花烟馆，如王印、丁发甲即开有这种烟馆。这类烟馆，用自家的床榻、烟具，开灯供客吸食，家庭中的妇女（包括妻子、女儿和儿媳等）侍候烟客，或陪客烧烟，齐头对卧，一人一口地吸食；或兼做暗娼，提供色情服务。



长春新京车站



长春因吸鸦片而将女儿卖为妓女的卖身契（日本统治时期）

五十一 1949年以前鸦片在黑龙江泛滥到什么程度？

日本占领后，黑龙江已是到处建立鸦片烟馆，仅讷河即有六处大烟馆：县城四处，拉哈镇两处，乡镇村屯到处都有卖大烟的。当时的大烟馆有三个等级：一等烟馆设有许多房间，且多为雅座，有的还有女招待，打扮得妖艳，专门为烟客烧烟，看火，卖弄风骚；有的大烟馆馆主为了多赚钱，竟然让自己的老婆、女儿以色情勾引烟客。那时，讷河流行一个下流小调，开头是这样的：“话说宋老三，他家卖大烟。一辈子无儿生个女婊娟，这姑娘年长二九一十八呀……”。二等烟馆的房间稍小，设有床铺，备有烟具，可就地吸食。三等烟馆则只有一二间门市房，没有床铺、烟具，只是零星贩卖熟膏。



旧时代的哈尔滨

五十二 1949年以前鸦片在安徽泛滥到什么程度？

民国10年左右，安庆全城有大小烟馆数十家。既有豪华的大烟馆，也有一些低级小烟馆。在安庆城西门一带有好几家低级小烟馆，凭女色引诱烟客。如高祥夫妇都是大烟鬼，为了“以烟养烟”，在糍粑巷租了一楼一底的单家独户的房子，开设烟馆。他的烟馆设备尚可，经常开二三盏灯，以妻子、女儿侍候烟客，其女儿高兰英颇有几分姿色，吸引了不少大小老板、商店大伙计前来吸食。

五巷口有个李小脚，是个寡居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在自己家中开烟灯，以其姘夫地痞蔡大宝挡门户，自己和两个女儿侍候烟客；家中也开二三盏烟灯，引诱西门外粮食行、棉花行的老板、大伙计前去吸食。

沟儿口有家伞店的楼上，有张老头子夫妇二人，带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儿开烟馆，由于一家三人都是瘾君子，家境破落，设备差强人意，只能吸引穷烟鬼吸食。

以上这些小烟馆，其主人的结果都很凄惨，高家门庭冷落，家败人散；李小脚女儿远嫁，自己死时无人替她入敛收尸；毛家连衣食也不周全；开花烟间的张大个子，因烟馆闹事，坐死牢中；张老夫妇入不敷出，衣被卖尽，贫困而死，其女儿骨瘦如柴，沿门乞讨，也饿死街头。之所以如此，大概是这些小烟馆的主人皆是瘾君子，穷极无靠，出此开烟馆养活自己的下策，结果却是家破人亡，适得其反。



安庆旧城门

五十三 1949年以前鸦片在江苏泛滥到什么程度？

江苏紧临上海，自上海开埠后，江苏的鸦片就泛滥起来了。昆山距上海50公里，自民国以后，烟馆日渐增多，一条短短的弓箭街，即有4家烟馆；全昆山县城，烟馆多达百余家。

不过，昆山的烟馆，多是低级的“燕子窠”，当地人称之为“烟灯”，大概烟具简陋，除一枪一灯外，别无长物吧。当时有人写打油诗，讽刺这种情形，诗中写道：“燕子窠燕多，数榻横卧如燕窝，烟泡敷在烟枪上，状如燕子衔泥做燕窠，吱吱呱，吱吱呱，吞云吐雾乐乎乎！燕子营窝人称道，人做燕窝命呜呼！”

当时，昆山境内有几个烟灯最著名：一是酒店弄二号龚阿三与丈夫合开的烟灯，龚氏妓女出身，染有烟瘾，日寇占领昆山后，在自己住所开设烟灯，并招雇了一批上海、苏州的妓女作招待，烟、妓兼营，为害一方。二是“双福堂”，是钱姓苏州妓女所开。钱氏妓女结识了一个日本浪人，合开了楼下卖淫、楼上卖烟膏的“双福堂”，也是烟、妓并营。三是西街口的一家烟馆，为青帮中人胡氏所开，有烟铺四五间，及“雅座”二间，并雇佣男女招待多名。四是南街一家烟馆，是昆山较早的燕子窠，以烟膏质量好闻名，深受大地主、大商人欢迎。他还在家设赌场，坐抽“头钱”，烟赌兼营。五是啸楼茶馆，是青帮中人周禹门所开，楼下开茶馆、书场、摆赌台，楼上开客栈、烟灯，并有暗娼陪宿，是烟、赌、娼三毒俱全的去处。



昔日苏州

五十四 1949年以前鸦片在浙江泛滥到什么程度？

温州城在清朝末叶即有很多烟馆，即使是冷街僻巷，烟馆也到处都是，不可胜数。温州的烟馆分二等，一是大土馆，这类烟馆都以房间雅洁，烟具考究，服侍周到招徕烟客。大土馆房内明窗粉壁，几榻洁净，并悬有名人字画，陈设古雅。金漆炕床上，冬天加盖皮套或棉垫、棉靠背，并添置火炉；夏天则换上芦花垫或龙须席。烟客进来，香茶、水烟、热毛巾源源送至；并雇有佣人代客烧烟、装烟；有钱的人甚至躺在烟榻上，一张口，就有象牙烟嘴送上嘴来，就可以吸食。烟具也很考究，烟盘有红木的、白铜的；烟枪以紫竹制成，更考究的则以甘蔗、象牙制成，配以白玉或象牙的烟嘴。烟斗也有炒斗、平斗之分，而以广东梁有轩朱砂斗最有名，斗角边配以银质马鞍桥。还有绵羊角烟盏、广东烟插、白铜灰扒、吴兴小茶壶。烟灯则以路桥灯，配以白铜花脚盘，虽一灯荧荧，黯如鬼火，但却被瘾君子称为“美人灯”、“迷人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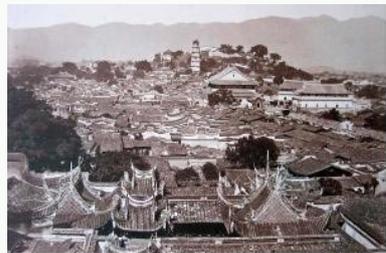
二是“煎烟馆”，俗称“鸦烟馆”，通称大烟馆。专门开灯供穷烟客吸烟，其房屋狭小，设备简陋，一个房间设有数张烟榻，大多是一副床板，两条木凳，床上草席一张，枕头两个，此外别无长物。板条桌上，放一缸粗茶，任客自喝。



解放前的温州

五十五 1949年以前鸦片在福建泛滥到什么程度？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烟毒十分严重。清末民初，漳州城区开设烟馆20余家，其招牌字号有：双合盛、合盛、协成、兴隆、德兴、珍香、惠馨、顺和等。烟馆的特征是，门前挂一竹帘，写上本馆字号，屋檐前挂一盏方形玻璃灯，写上红字为标识。各家烟馆，大体上屋子里有厅、有房，摆设无帐烟榻数张，大榻可供五六人，小榻可供二三人横躺吸食，各置有烟盘，其中配有烟枪、烟灯、烟扦、茶具等。烟枪一般用甘蔗套上竹筒，配上烟斗、烟嘴制成。当地人喜欢这种烟枪，有“甘蔗入竹筒，吸了才会爽”的说法。国民党实施“寓禁于征”后，烟馆一夜之间变成了“戒烟所”，仍旧卖烟，侍候瘾君子，所谓“亏本生意无人做，杀头生意争着干”，莫此为甚了。



福建于山白塔寺

五十六 1949年以前鸦片在湖北泛滥到什么程度？

1933~1938年，汉口各个地区都设有售吸所，是供人吸食鸦片烟的场所，亦即烟馆。分甲乙两级，甲级的房间都是雅座，铺设讲究，并雇有专人侍候烧烟，如后花楼的三太、统一街的福生等。乙级则为普通房间。当时汉口有22家售吸所，只有2家为甲级，其余皆为乙级。每个售吸所都备有百两至几百两的烟膏，10至20支烟枪。烟枪以老膏烟枪为最好，其价格高达100银元，普通烟枪则30银元。床位也颇讲究，冷有毛皮垫褥，热有广东凉席，还备有泥金茶壶、上好香茶。

售吸所还设门市，零售烟土、烟膏、烟泡。每家都雇有工人，少则10人，多则二三十人。工人每月工资8至10元，每天工作10至16小时。售吸所每月营业额最少四五千元，可净赚一千元，但必须按时交纳营业执照费、戒烟执照费等税捐。（参见田梅村《旧社会鸦片烟业在汉口》）武汉沦陷后，售吸所有了很大发展，共分甲乙丙丁四等，甲等每次配给烟土十两五钱，依次递减为7两5钱、4两5钱和3两。当时武汉共有100余家大小不等的售吸所。



昔日汉口

五十七 1949年以前鸦片在湖南泛滥到什么程度？



长沙湘江边

1920年左右，辰溪县城刘运宽开了一个大烟馆，设有专门烟床两铺，烟具齐全，馆舍整洁，招待“殷勤”。他的儿媳张氏颇为婀娜多姿，又晓风情。凡是有体面的烟客上门，都由她招待：陪抽烟，伴闲谈，调笑嬉戏，毫无禁忌。由此，招徕了不少人前往。1930年左右，刘黑也开了烟馆，其房舍狭小，烟具低劣，没有专门烟床，只好在自己的睡床上营业。不过，他经营有方：对老客求现不赊，对新客稍微通融，对“发蒙者”免费供应。

五十八 1949年以前鸦片在广西泛滥到什么程度？

梧州是云贵两省烟土集散地，烟毒泛滥成灾，吹烟馆（即大烟馆）遍及全市各个角落，其中四方井附近较为集中，多达10至20家。吹烟馆是公开吸食鸦片的地方，规模都很小，必须向官方领取牌照，交纳烟灯捐。一些大的商店，也开设烟灯，让顾客边吸烟，边谈生意。

昔日梧州



五十九 1949年以前鸦片在四川泛滥到什么程度？

四川吸烟的人很多，烟馆林立。全省各县各乡，每个角落，即使没有旅店、饭店，也有烟馆。当时有人形容说：“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城市的每一条街，即有几家烟馆。有些烟馆外面，写着“雅室”二字，大烟馆内部陈设富丽堂皇，有沙发躺椅，并备有妙龄女郎，替客烧烟；还附设小卖部，供应糖食水果。烟馆要缴纳销售税和红灯税。

除烟馆以外，还有其他行业兼营烟馆生意，如旅馆内附设烟馆，浴室附设烟馆，妓院附设烟馆，山货、棉纱、匹头等店铺、交易场所附设烟馆，从重庆到泸州、叙府的轮船附设烟馆；此外，长江边上、峨嵋山上还有流动烟摊，备有烟灯、烟膏、供人吸食。

四川成都，1924年以前，烟馆多在裁缝店的楼上，茶馆、饮食店的后堂，不挂招牌，暗中营业。自1924年3月后，四川军阀和官府发布“禁烟令”，发给烟民“戒烟证”后，烟馆就打出“售店”的招牌，公开营业了，吸食者可以自在地在售店里吸食了。当时，成都到处都有售店，估计全城约有2000余家，烟灯1.8万盏，每日可供10万人吸食，占当时成都人口的1/6。上等烟馆有卡尔登、阿尔岛、太平洋等几家。还有在公馆内开设烟馆的，这里陈设很华丽，有貂皮褥子、红木床、章罗斗子、虾须枪。有“烧匠”打烟，有卖糟蛋、白糖藕粉、三合泥的糖食担子，有卖艺卖唱的男女吹拉弹唱。下等烟馆，一般都开设在僻街背巷的铺面和杂院里，以及城外穷人聚居处。这些烟馆设备非常简陋，备有木板通铺，草席和枕头，床边备有烟盘子，内装烟灯、烟枪、打石、扦子及一小杯烟膏。此外，成都还有所谓“兜兜烟馆”，其实就是流动烟馆，卖烟之人手提兜兜（内装烟具、烟膏），沿街叫卖，随时供烟客吸食。四川邛崃，烟馆通称红灯烟馆，一般都安置床铺几间或几十间，床上有烟盘，盘内有烟灯、烟枪。烟馆的门面是经常遮蔽着的，只开一道小门，门口或屋檐挑枋上挂着一块长方形或正方形的玻璃灯，正面写上“一道烟馆”或“烟馆”字样，灯的两侧还写上“闻香下马，知味停车”等字样的对联。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夕，邛崃有大小烟馆约800余家。

四川江津，1917~1935年为鸦片盛行期。此时，江津烟馆公开开设，随处可见，即使山村路旁小店，亦有烟馆。以县城城关而言，就不下五六十家。连河边（即长江边）棚户，也有三五家烟馆，供船夫、力脚吸食。后来，城中出现了“天然”、“独逸”、“瘾逸”、“几水塘”等烟馆，居然冠以雅座，以广招徕。室内陈设华丽，并雇有“枪手”（受雇打烟、服侍）。大的烟馆有烟灯十余盏，小的则二三盏。

四川宜宾，大街小巷烟馆林立，公烟馆即有100多家、烟灯约2000盏，此外街头上也有“兜兜烟馆”。有名气的大烟馆有“蓬莱”、“厚味村”、“三层楼”、“大来”、“洁雪”、“北园”等。其中，大来烟馆烟具最为考究，北园烟馆更为突出，它设有单间，以供私人谈话。这些大烟馆冬天有火盆、烘柜、棉被、皮褥，夏天则设凉枕、凉席，小卖部则供应茶、香烟、糖果、水果等。每一床位，备长、短枪各一支，备烟客选用，还有“叉手”（又名枪手、烟手）代客烧烟。有时，还可见耍童开烟，调笑戏闹。并备有一二跑腿，代客送东西、购物。



昔日四川



昔日宜宾



昔日成都

六十 1949年以前鸦片在云南泛滥到什么程度？

民国九年(1920)弛禁以后，云南大理烟毒流行日盛，在下关，仅四方街、西大街、正阳街、振兴街、仁民街和鸳浦街一带就开有上百家大小烟馆。其中杨记烟馆设床三张，备烟具6套；李记烟馆，设床6张，备烟具12套。烟馆既是吸烟的地方，也是洽谈生意和赌博的场所。(参见苏松林：《大理地区禁烟肃毒述略》，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1922年的云南大理



六十一 1949年以前鸦片在甘肃泛滥到什么程度？

甘肃天水县城里有五六家大烟馆，当地人叫“一道馆”。所谓“一道馆”，就是只允许烟客吃一道，二道、三道烟留给开烟馆的人。民国十九年(1930)川军入天水，烟馆大兴，县城一时有三四十家。不过多是只有一张床铺，一二副烟具的小烟馆。较大的一家在公安局隔壁，门面四间，进深四间，共有八张床位。设备讲究，除五六套一般烟具外，还有二三套精制的烟具，专供上等人使用。门上无招牌号匾，只挂一个蓝布夹板门帘。(窦建孝：《天水鸦片流毒见闻》，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六十二 各地烟馆总体的特点及危害是什么？

第一，自鸦片传入后，各城乡都建立了烟馆；鸦片泛滥之后，烟馆数量之多、分布范围之广，都是令人吃惊的。烟馆多于旅栈、饭店的情形，在各地都存在；烟馆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即使在官府严厉禁止之时，它的变种——燕子窠、私烟馆也广泛存在着。

第二，烟馆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烟馆设施之豪华、服务之周到，都是很突出的；下等烟馆则设施简陋，姑且满足一下烟瘾，其他无法提及了。中等烟馆则介于二者之间。这样，社会各个阶层：大地主、大资本家、富商；温饱小民；贫困的苦力，都可以找到与自己的经济状况相适应的烟馆，过过烟瘾。

第三，大烟馆的命名、装饰，存在着“雅化”的倾向，它的命名有三种：一是传统的商业企业式的命名，二是极力渲染大烟之美妙；三是赶时髦，以“洋名”为烟馆命名。开馆之人命名之用意，颇耐人寻味。烟馆之装饰，多以对联、名人字画，给人以高雅的印象。

第四，烟馆是一个信息传播的中心。这里汇聚着三教九流，或谈生意，边吸烟边聊天；或商讨对策，以偷盗抢劫；或说长道短，讲讲当地名人轶事，风流雅事，甚至闺门丑事等等，不一而足。

第五，烟馆是藏污纳垢之地。在烟馆中，有妓女侍烟，有赌局存在，烟、赌、娼三而合一，在烟馆中都可以满足了。这里又有三种情形：一是烟馆开赌场、雇妓女；二是妓院开烟灯，设赌局；三是赌场设烟灯，有妓女存在。当然，黑社会之帮会分子、流氓无赖、地痞也汇聚于烟馆，谋划着鸡鸣狗盗之事。

第六，有些烟馆也有文化娱乐活动，如有说书的、唱戏的、杂耍的青年男女，为烟客服务，提供各式文化娱乐活动，使烟客在烟瘾过后，听戏、看杂耍、听说书。

第七，烟馆是一个重要的税源，烟馆要交纳营业费、执照费、戒烟费、枪捐、红灯捐等捐税，而且遍地皆是，数量巨大，因此成为租界当局、军阀、国民党政府的重要税源之一。正因如此，他们为贪图厚利，对禁烟之事不能痛下决心，彻底根除。

第八，烟馆开设者，或为与官府、军阀有勾结的富商，他们以烟毒赚取了巨大利润。为加强竞争，他们聘请高手技师煮烟、烧烟，改善服务。而那些私烟馆、燕子窠的开设者，他们多为穷极无聊，自己及家人抽大烟，而试图以烟养烟，其结局无不是家破人亡，那些以自己妻女服侍烟民的，更是丢人献丑，名誉扫地。



六十三 甲午战争后到民国前中国有哪些禁烟呼声？

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加速了大清帝国的衰落，同时唤醒了部分中国人。一些有识之士，纷纷探求救国之路，反思政治、社会问题。在官僚阶层，也有一些官员开始关注鸦片问题，如曾国荃就曾在1878年提出禁止罌粟种植，说“多种一亩罌粟，即少收一亩五谷”。封疆大吏张之洞，看到山西烟毒的泛滥，设立了戒烟局，并且呼吁在全国范围内禁种罌粟。张之洞在主政湖北的时候，也反对吸毒、缠足、风水迷信等陋习。在天津，也成立了戒烟局。1895年新疆巡抚陶模上奏章，列举应实施的12项举措，其中第七项就是主张禁吸洋烟。1904年湖南学政拟了学校禁烟的条例，提出凡生员中有烟瘾的不能列为优等，童生者有烟瘾的不能入学。朝廷同意该项建议，并发布各省照办。

两广总督严禁军人吸食鸦片，四川也规定旗人军队不得吸食鸦片。

民间反对吸食鸦片的呼声日高，《时报》、《警钟报》、《东方杂志》等纷纷发文阐述鸦片烟毒对国家及百姓的危害，要求政府采取断然措施加以禁止。

1899年，广东人苏泽东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有关禁吸鸦片的文学集《梦醒芙蓉集》3卷，收录历朝禁烟诗41家，禁烟文35家，戒烟药方10余种。著名爱国人士维新派主将之一的谭嗣同，作《罌粟米囊谣》：“罌无粟，囊无米，室如县罄饥欲死。饥欲死，且莫理，米囊可療饥，罌粟载千里。非米非粟，苍生病矣！”。



谭嗣同

六十四 清末海外华人有哪些禁烟活动？

自从英国人在印度广泛种植罌粟制造鸦片以后，鸦片不仅在中国大陆泛滥，同时也流毒东南亚，很多华侨也沾染了这种恶习。吸食鸦片，严重地损害了海外华侨的身心健康，并且耗费了大量财产。20世纪初，进步的华侨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鸦片对国家、民族的巨大危害，开始发起了禁烟运动。



昔日新加坡

在华人聚集的新加坡，《叻报》、《星报》、《天南日报》等报于1889年以来，陆续发表了支持禁烟，呼吁华人戒烟的文章。当地华侨医生殷雪村及林文庆在1906发起成立了禁烟团体振武善社，筹集资金建立戒烟中心，免费为吸毒者提供戒烟服务。在当地医学博士伍连德的倡导下，檳榔屿于1906年成立了禁烟协会，并设立戒毒中心。

1907年，在怡保（现马来西亚霹靂州怡保市）举行了禁烟大会，有3000多人参加，并通过了10项有关禁烟、限制鸦片消费的决议。

在华人聚集的新加坡，《叻报》、《星报》、

《天南日报》等报于1889年以来，陆续发表了



现在的怡保（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第一次禁烟大会在这里举行

六十五 清末中国各地有哪些禁烟组织？

在民族自强精神的指引下，中国各地陆续开始了对鸦片的抵制、禁止的浪潮。各地纷纷成立了各种禁烟、戒烟团体。宣传毒品危害，鼓励民众戒毒。

在浙江，奉化、鄞县、嘉兴等地，成立了禁烟自治团体，在自治章程中规定了禁烟内容。绍兴县所定的《乡约十四条》里，也包含禁吸鸦片内容。徐勤等进步人士发起建立的戒鸦片会，在广州、上海、香港、澳门设有分会，在日本设立总会。该会禁止吸毒者入会，研究戒烟药方，编写印发宣传品。

首任中国驻意大利公使的爱国知识分子许珏也大力提倡禁烟，1898年，许珏入山西巡抚胡聘之幕。为推动山西的变法维新，许珏选定以禁烟为社会改良的入手处，著《山西商务以禁烟为本议》（上、下）与《禁烟余议》，详细论证了山西禁烟的必要性，并拿出了可行性方案。其后许珏又在江苏开展禁烟活动，并连续上书朝廷，后又去广东从事禁烟活动，很有成效。

1904年，福建爱国人士林绍年、陈宝琛、邵质诚、刘学绚、罗金城、林炳章、张赞廷等“十贤”，联名发起了去毒社。去毒社的章程规定：凡是新染鸦片烟瘾的人及他们的子弟，一切学校都不准收。有故意再去吸食鸦片的，如果不立刻戒除毒瘾，无论何人学校均不予录用。

1905年去毒总社宣告成立，社长为林炳章（林则徐曾孙），地点设在福州，并且在其他地方设立了分社、支社。去毒社的成员没有薪金，宣传、劝导人们戒烟，还施舍戒烟药品。1906年（清光绪三十一年）5月1日，福建去毒社成立一周年，在福州举行大型庆祝活动。人们敲锣打鼓，游行队伍举着林则徐像，浩浩荡荡，绕城一周，将缴获的烟土烟具列一长队，随游行队伍至桥南泛船浦海关埕，当众焚毁。官府要员、社会各界、各国领事、各洋行当时都到现场观看，福州城万人空巷，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福建去毒社南台第一戒烟局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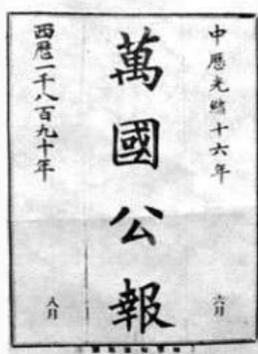
六十六 清末在华教会有哪些禁烟活动？

在清末，在中国的部分传教士、教会组织，也参与了禁烟活动。

如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创办的中国第一个科普期刊——《格致汇编》月刊，就曾刊登文章主张戒掉吸鸦片恶习，并且普及了一些戒读知识。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1868年，创办并主编《教会新报》，后改名《万国公报》，为19世纪介绍西学最集中的期刊。在《万国公报》上林乐知对中国人吸食鸦片及迷信等习惯进行了批评。

一些教会组织，也正参与禁烟活动，如在1877年5月及1890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传教士大会上，都有关于鸦片的内容。提交会议的论文中，有《鸦片的应用带来的罪恶》等。并且通过了《禁烟之议案》六条，反对继续进行鸦片贸易，建议制止吗啡等所谓戒烟药物的销售与滥用。会后高尔特医生在杭州设立戒烟所，达莱医生在宁波建立了戒烟所，其后各地陆续出现了戒烟所。1907年基督教第三次大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号召各级教会重视禁烟工作，并指出中英政府只图财政收入是禁烟难以取得实效的原因。



林乐知创办并主编的《万国公报》



傅兰雅 John Fryer 1839-1928编辑的图书

各国传教士组织了禁烟联合会，会长是苏州传教士杜布斯。该会因为苏州，所以被称为苏州禁烟会。该会曾经在1906年5月征集到1333名传教士的签名，向中国皇帝呈文呼吁禁烟，由两江总督转呈给光绪皇帝。

六十七 《禁烟章程十条》是怎么回事？

清朝末年，鸦片烟毒在全国迅速蔓延，并侵蚀到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挽救清王朝衰败的命运，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一月廿九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变法。开始了晚清最后10年的“清末新政”时期。在此期间，清政府将禁烟列为“新政”的主要内容，并借机发动了一场比较认真，颇具声势的禁烟运动。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三日（1906年9月20日），清廷谕令政务处：“著定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这一谕令的发布，标志着清末新政时期禁烟运动的开始。

政务处于11月制定《禁烟章程十条》，规定禁种、禁进口、禁新吸、戒烟瘾、关烟馆。同月，清政府在京师设立禁烟总局，在上海设立禁烟总会。1907年12月，中国与英国达成禁烟协议，规定十年内逐年递次禁绝英印鸦片进口；对进口鸦片征收重税。1908年3月，清廷坚称：“无论如何为难，必期依限断绝。”1908年4月，任命禁烟大臣。

六十八 宣统时期有哪些禁烟措施？

清宣统皇帝继位后，于1909年初颁发了《禁烟条例》，规定凡是种植罂粟制贩鸦片、开设烟馆制造烟具的，都要判处有期徒刑，并严惩贩卖吗啡。1909年，民政部与修订法律大臣又会定编《禁烟惩罚条例》，使惩办贩运、吸毒有了法律依据。

除了颁布法律法令，清政府还改革征税，1908年起每年减少一成进口及对国内土烟的征税，同时想办法从其他途径增加税收，如增加盐税，整顿田房契税等。一些地方官员也提出了增加其他税收的措施，用以缓解因鸦片税收减少而产生的压力。

六十九 清末各地是怎样禁种罂粟的？

1907年清政府颁布的《新刑律》里面列有鸦片烟罪，1909年颁布的禁烟条例里规定，凡栽种罂粟制贩鸦片都要受到惩处。随着各地对这些法律法令的执行，种植罂粟的情况有所改变。通令各州县调查罂粟种植面积，由官府统一发给牌照，按年递减1/9，提前禁种者奖励，过期不禁者地亩充公。

到1909年，山东原有种植罂粟的76个州县只剩下4个州县尚有烟田。

山西本地罂粟种植比较普遍，禁种后曾经受到抵制，但到了1909年，35万亩罂粟田已经改种其他作物。

四川也是罂粟种植较多的省份，到1910年，已经有一半罂粟田改种。

陕西强令农民改种棉花，并设立农业学堂。

广西官方颁布《劝种桑棉蓝靛各项以抵禁种罂粟》的公告，督令民众改种。

各省制定了禁种时间表：一，江苏、安徽、河南、云南、福建和黑龙江等六省于1908年下半年全面禁种。二，奉天、吉林、直隶、山东、江西、浙江、湖北、湖南、新疆、广东和广西等11省在1909年下半年全面禁种。三，陕西、甘肃、四川和贵州等4省每年递减20%，到1913年全面禁种。



清末云南昆明的官员

七十 清末各地禁种罂粟的实际情况怎么样，清政府有哪些相应措施？

清政府对各省禁种的情况多次进行过核实，结果发现黑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均有一些州县在种植罂粟。吉林、新疆、云南虽然自报禁绝，实际上仍有私种。陕西、甘肃、贵州等禁种进程也低于原定计划。

1910年秋，为严肃法纪，清廷降旨将吉林、黑龙江、河南、山西、福建、贵州、新疆等省的督抚交部严加议处，贵州的宁州知府赵国藩也因禁烟不利被免职。

1908年四川总督赵尔巽将10禁绝期改为2年，1910年派出四位道台和48位委员到各地检查禁烟改种情况。1909年山东排除53名候补知县到各地检查禁种情况。



赵尔巽

七十一 清末禁吸鸦片的措施有哪些？

各地在禁种罂粟的同时，积极展开禁吸鸦片的行动，设立戒烟所与查烟官局，强制戒烟。通过各种努力，禁烟取得一定成效。

如江苏原有熟膏店12790家，到1909年初已经减少到2830家，仅苏州一地就关闭了1960家。山东设立戒烟会349个，戒烟者达85000人。陕西有戒烟局400余所，戒烟者157000人。直隶的禁烟所有200余个，铲除烟馆800多个，查获秘密贩运案件1300起。

天津、北京、广州、福州、贵州等地的烟馆大部分于1907年关闭，四川于1907年在成都设立戒烟总局，广东陆续在各州县建立戒烟医院。在上海，官方要求租界内的烟馆在六个月内关闭，华界的烟馆也逐渐停业。



七十二 清政府是如何禁止官员吸食鸦片的？

清政府曾下令官员在六个月内戒除鸦片恶习，因效果不好，于1907年秋将未能戒除烟瘾的睿亲王奎斌、庄亲王载功、左都御史陆宝忠和副都御史陈名侃等王公重臣，暂时开缺（停职）。并派禁烟大臣在戒烟所检查官员是否戒除了毒瘾。方法是：在戒烟所内设立带有玻璃窗的浴堂，被检查的官员要脱衣入浴，检查人员在外监视，以防携带鸦片入内。被检查的官员们浴后要换上禁烟所提供的衣服，留住7到10天，查处有烟瘾，必须戒除，否则即给革职。内阁学士文海、载昌等就因此被革职。

山东巡抚袁树勋曾奏请：将属员中所有未能戒毒的人员革职，各省也纷纷效仿。



袁树勋（1847~1915年）1906年后历任江苏按察使顺天府尹、民政部左侍郎，山东巡抚。1909年任两广总督。

七十三 什么是《中英禁烟条约》？

188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后，鸦片问题作为国家耻辱与衰败的象征，越来越受到了有识之士的抨击，禁烟呼声空前强烈，不少地区出现了自发的禁烟团体与禁烟活动。1906年9月20日，光绪皇帝下达谕令，宣布严厉禁烟。此时，随着中国鸦片市场逐渐由土烟所垄断，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利润逐年减少，加之英国人民反对鸦片贸易的呼声日甚一日，英国政府对鸦片问题的态度也有所转变。清政府经过与英国的多次交涉，双方于1908年3月签订了《中英禁烟条约》。



光绪皇帝

七十四 《中英禁烟条约》的内容是什么？

- 1, 渐禁印度鸦片进口, 规定逐年减少从印度输入中国鸦片的数量, 从1908年起10年内减尽;
- 2, 中方派员前往印度加尔各答监视拍卖打包;
- 3, 增加洋药进口税;
- 4, 租界内实行禁烟;
- 5, 禁止香港烟膏输入大陆;
- 6, 禁止吗啡进口。

以上六项交涉内容，虽然是由外务部首先提出，但最终都是按照英方修改方案执行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交涉的内容并没有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只是以照会的形式达成共识，这为以后英方强迫清政府续定禁烟条件提供了把柄。（文章来自胡春惠、薛化元主编：《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变迁》，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2004年版，第171-189页。）



在上海租界耀武扬威的外国军队

七十五 上海万国禁烟会议是怎样召开的？

万国禁烟会议是20世纪初在上海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也是全球性禁毒运动的开端。此次会议的发起国是美国，由清政府承办。1906年，菲律宾主教、美国圣会教士勃兰脱写信给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提请他关注国际禁毒问题和美属菲律宾的鸦片问题。在国务卿伊莱休·鲁特的建议下，罗斯福总统决定在远东地区发起召开一次国际禁烟会议。同年10月17日，美国驻英公使黎德在谒见英国外交大臣葛雷时，转达了罗斯福总统的意见，希望与鸦片贸易有关的美、中、英等国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调查远东的鸦片问题，讨论禁烟事宜。一个月后，英国政府正式同意了美方的建议。

1908年5月间，美国邀请清政府参加万国禁烟会议。美国公使柔克义在给清政府的照会中称：“以美国政府约请东方有属地之法、德、美和日本等国政府，各派专员考查鸦片情形，询请中国愿否派员会查”。接到美方的邀请后，清政府决定以南洋大臣、两江总督端方为首组团与会。

经过一年多的国际间磋商，各国定于1909年2月1日在上海举行万国禁烟会议。之所以选择上海为会址，是因为美国召集万国禁烟会的目的就是讨论远东地区的鸦片问题，而1906年清政府开始推行的禁烟运动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中国的鸦片产量和烟民人数均有所下降，受到世界瞩目。上海是当时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鸦片进口、转口与消费口岸。19世纪70年代，上海的鸦片进口量已占全国输入总数的71%，上海的租界更是烟害的孽生地，租界当局公然颁发经营烟馆的许可证并收取税款。由于租界的存在，单凭清政府的力量很难彻底肃清烟毒，要绝禁鸦片尚需有关各国的协助来共同完成。当时上海的禁烟态势恰好是20世纪初国际禁烟形势的一个缩影。

七十六 上海万国禁烟会议有哪些成果？

大会通过了9款决议案，主要内容是：一、与会各国承认中国对禁除鸦片烟出产销之事所付出的真诚努力和获得的进步；二、各国将在本境或属地内逐渐推行禁吸鸦片的法令；三、各国将作医用以外的鸦片均视为禁品，并应防止鸦片运往禁烟之国；四、禁止制售吗啡；五、各国应在中国的居留地和租界内禁烟；六、有关药物法规属领事裁判权限内，各国在华公民应予遵守等。从内容上看，这些决议案对中国的禁烟运动有所裨益，但上述决议案并无法律的约束效应。

以这次会议为起点，国际禁烟禁毒活动逐步发展壮大。1912年，12个国家又召开了海牙国际禁烟会议，通过了具备法律效用的《海牙禁烟公约》。



上海江中饭店，万国禁烟会议在此举行

七十七 清末禁烟取得哪些成果？

1，遏制了罂粟种植的进一步蔓延，减少了中国土烟的生产。

在贵州，鸦片产量缩减到五分之一；在四川，鸦片产量由1906年的23万担降至1910年的五万担；云南的鸦片生产减少了90%；全国的鸦片产量1910年比1906年减少了近80%。

2，鸦片的进口量也大量减少。由于1907年与英国签定了《中英禁烟条约》，英国对华鸦片出口大量减少并最终停止了公开出口，因此进口的鸦片断绝了合法渠道。

3，由于政府采取了各种禁烟手段，民间的禁烟活动也越来越多，吸食鸦片的人群有所减少。



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销售鸦片的营业执照

七十八 清末禁烟有哪些不足与教训？

清末禁烟取得不小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与教训。

贯彻执行，或者贯彻落实不利。有些地方官员，对禁毒阳奉阴违，导致局部地区鸦片继续泛滥。

其次是禁烟的一些法律法规等存在一定漏洞，如对高级官员禁烟措施不够有力等，导致一些高官钻空子，影响了禁烟效果。

第三，因为鸦片烟税是清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这使种植罂粟不能根本被禁止。比如陕西到1911年仍有许多地方在种植罂粟。有些省份因为财政困难，就从鸦片税上想办法，得到政府的认可。这些都影响着禁烟。



第四，有些省份、地区种植罂粟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成了农民赖以生存的经济作物。清政府颁布禁种条例后，往往辅助措施不力或者根本没有，就导致政府与烟农矛盾的激化，甚至酿成民变。同时，没有爆发民变的地区，因为禁种罂粟，导致了大量农民更加贫困，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



被枷的犯人



清代对犯人行刑

第五，由于清政府的权利不能达到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所以帝国主义占领的租界地常成为吸毒者的避难所。同时由于租界当局对贩卖毒品的默许，进口毒品往往从租界向全国传播。

七十九 清末禁烟为什么没能根除鸦片？

首先，在清末，大清政权经过连年内忧外患，已经是摇摇欲坠。尽管皇帝、政府认识到了鸦片烟毒的危害，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因为整个体制已经腐烂，政令往往不能得到贯彻执行，很多的官员缺少责任心。所以，尽管禁烟取得了很大成果，但往往难以持续；更有些地方没有能够达到要求。说到底还是政权缺少足够的力量来维持它的运转，所以禁烟就不可能彻底。

其次，因为外国势力的强大，租界在中国各地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禁烟的彻底。而在当时，中国政府根本没有力量收回租界，租界当局也不可能全力支持、配合中国政府禁烟。

第三，中国经济落后人民贫困，知识不普及，人口素质低。一方面种植罂粟是某些地区农民的唯一生活来源，如果不切实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禁种就很难。而在当时，解决这些生活问题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清政府财政困难，根本没有能力解决。



汉口英租界



天津日租界



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吸食鸦片的许可证明。统计表占据了许可证将近一半的面积，表明政府禁烟无门，只好提倡烟民“计划型消费”。

八十 民国初期禁烟情况如何？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权，国内外禁烟呼声高涨，各地进步人士纷纷上书国民政府，要求继续禁烟。

1912年3月2日，孙中山先生颁布禁烟令，要求禁止吸食、种植毒品。5月，内务部下属的全国禁烟公所成立。

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后，继续实行禁烟政策。在临时政府颁布的新刑律中，列有鸦片烟罪10条。规定了对吸食、贩卖鸦片将被判刑。同时各地禁止鸦片，再有种植罍肃的将受到惩处。

各地军政府也相继颁布禁烟法令，湖北、湖南、西北、浙江、江苏、江西等地新政权纷纷发布禁烟条例、规定等，响应民众呼吁及中央政权，禁止毒品。



袁世凯



孙中山主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次内阁会议



洪宪元年（1916年），河南税务部门签发的购买烟土传票

八十一 什么是民国初期的“四禁”？

“四禁”即禁种、禁运、禁售、禁吸。

禁种：1914年3月5日，民国中央政府颁布《禁种罍粟条例》，共11条，宣布以后不得再种植罍粟。各地方当局、军政府也纷纷发布禁种命令并采取各种措施铲除烟田。

禁运：各地方政府陆续发表禁止贩运令，如湖北、湖南、浙江都宣布贩运为非法，禁止土烟入境。民国中央政府还在1914年4月公布了《吗啡治罪条例》12条，严惩贩运、制造吗啡。

禁售：1912年5月京师警察厅发出通告，限本市土膏店在5月16日前停业。安徽、武汉、山西、江苏等地也纷纷发出通告、通令，勒令销售烟土的商店停业。

禁吸：民国政府对烟民进行了普查，发该牌照，逐渐递减，限期戒断。各地还成立戒烟局，强制性地让成瘾者戒烟。



民国14年（1925年），北京悟真堂公所签发的戒烟酒证书

八十二 民国初各地禁烟有哪些激烈措施？

湖南省曾经以极端措施惩治吸食鸦片，枪毙了十几个吸食的人；浙江军人张载洋出任省禁烟督办，带兵在各处巡查，遇有不法按军律执行；陕西统制制作了四具铜铡，陈列府门，严厉惩治吸毒贩毒；安徽曾搜缴洋烟7箱，价值21000两，都督柏文蔚下令全部焚毁；江西曾没收焚毁英国商人的鸦片多箱。

下令焚毁英商鸦片的柏文蔚



八十三 孙中山先生对待鸦片是什么态度？

1894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李鸿章书》中，认为本土种植罂粟有利于抵制英国向中国输送鸦片。当英国在印度的罂粟种植消失了，向中国输送鸦片停止了，中国再实行禁种。

1912年，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立刻就命令内务部厉行禁烟。接着他又发布禁烟令，呼吁：“务使百年病根，一旦拔除，强国保种。”

孙中山先生下野后仍然致力禁毒宣传，亲自致书给伦敦各大报馆，呼吁英国人民同情并援助中国的禁烟运动。

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孙中山



八十四 日本怎样开始对华贩毒的？

日本在占领我国台湾后，曾于1898年公布《台湾鸦片令》实施鸦片专卖。日本台湾总督后藤新平（后任满铁首任总裁），大力支持日本医药公司在台湾生产吗啡，然后输入到中国大陆。参与制造向中国贩卖吗啡的日本公司有：“星制药”、“大日本制药”、“内国制药”、“三共制药”等。

日俄战争后，日本就在中国东北进行鸦片走私、贩卖毒品的活动，以此毒害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从中牟取暴利。日商的这些非法活动，得到了日总领事馆的庇护。1911年，日商在沈阳贩卖吗啡，日总领事小池张造极力否认。日商平野原一等人海龙府开设药铺，售卖吗啡。日商打着吗啡可以戒除鸦片烟瘾的招牌，在满铁附属地内公开销售和注射吗啡，日本侵略者明确规定，吗啡等毒品只向中国人销售，许多中国人因“戒烟毒”而染上扎毒，无力自拔。为了欺骗中国人民，这些商号有的被冠上“长命堂”、“永寿堂”等冠冕堂皇的名字，实则干着使中国人丧命和短寿的勾当。



民政长官時代の後藤新平

臭名昭著的日本驻台湾总督后藤新平

八十五 军阀混战时期中国的禁毒是什么情况？

1917—1927，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这给禁毒造成极大危害。各地武装势力独霸一方，为利益驱动，常常鼓励甚至强迫农民种植罂粟，毒品重新在中国蔓延。其表现为：

1，罂粟种植死灰复燃

清末民初的几次大规模禁种，本来已经使罂粟种植大为减少。但由于军阀混战，各地罂粟种植死灰复燃。在东北、河北、山东、陕西、河南、四川、云南、贵州、福建等省，罂粟种植非常普遍，为当地重要的税收来源。



流浪乞讨的饥民

甘肃省政府曾公开号召种植罂粟，省内每一县都有罂粟种植；东北地区取消禁种后辽宁的烟田在20年代曾达到200万亩；安徽省到1924年有五分之一的土地种植罂粟；福建军阀更强迫农民种植罂粟，有些地区罂粟的种植面积占耕地的70%—90%；贵州、云南的罂粟种植站全省耕地的三分之二。其他如湖南、湖北、江苏、江西、广西、浙江等省，罂粟种植也逐渐蔓延。



陕西省省长刘镇华

陕西省自1918年刘镇华当了省长后，与督军陈树藩一起大开烟禁，并且强迫农民种植罂粟，征收“烟亩罚款”，大发鸦片财。

2，农业生产遭到破坏，

人民生活更加贫困

罂粟种植面积的积聚增加，必然破坏农业生产。中国历来是人均耕地最少的国家之一，一旦耕地遭到侵占、破坏，则必然导致饥荒等灾难性后果的出现。



四川的饥民

到1925年，全国罂粟种植面积已达1800万亩，根据初步估算大约少收540000万斤。粮食减产，粮价就必然上升，结果就是造成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一遇自然灾害，哀鸿遍野，人民流离失所。

3，吸毒人群的剧增

由于各地禁烟政策遭到破坏，曾经被关闭的烟馆重新大量开张，贩卖烟毒的店铺重新营业，导致吸毒人群的大量增加。



兰州大烟馆

在华北地区，仅仅北京一地烟土一年就能销售1080万两。天津更是烟馆林立，政府警察从不干涉、过问。

在福建，曾经有“烟馆多于米店”的说法，仅厦门、龙溪、闽侯、宁德、南安、长乐六县，就有烟馆1200以上；

安徽省是产烟区，鸦片比较便宜，一两烟土只卖三角钱，这就导



流落街头的穷人也吸鸦片

致了贫困人群也吸食鸦片；广东、广西两地烟民非常多，汕头一地就有数百家烟馆。广西自1922年弛禁以后，烟民大增；湖南以湘西为毒品重灾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烟枪。省会长沙有烟馆7000余家。

八十六 各地军阀对鸦片是什么态度？

各地军阀，为了维持其庞大的军费开支，扩充实力，几乎都参与了肮脏的鸦片生意。或鼓励甚至强迫所占领的地区种植罂粟，课以重税，从中牟利；或者参与贩卖，武装押运。

广东军阀龙济光是比较早靠鸦片筹措军费的，他在1914年在全国率先实行鸦片公卖制度，从中获得巨大利益。

西北军阀也依靠垄断鸦片买卖而使实力不断增强，他们搜购西北烟土贩卖到华北一带，然后换取军械弹药。

陕西军阀刘镇华强迫农民种植罂粟，征收“烟亩罚款”，大发鸦片财。陕西南部的吴新天勒令陕南25县种植罂粟，汉中盆地40%的耕地变为罂粟田，每年360万军饷皆由此来。



云南军阀唐继尧大开烟禁，1920年云南罂粟田已经达到36万亩，唐继尧下令扩大种植面积，到了1923年罂粟田已经达到70万亩，鸦片收入占其财政收入的30%。



广西军阀陆荣廷为扩充实力筹措军费，鼓励部下及商人向云南、贵州购买鸦片，并以军队护送，收取税款。



湖南军阀赵恒惕占据盛产鸦片的湘西，其军费开支几乎都来自鸦片。他每年有大约400万元以上的收入，全部来自鸦片。



军阀张宗昌早在东北投靠张作霖时就让部下种植罂粟，后在江苏、上海等地，更是大力贩卖烟土，大发横财。



冯玉祥将军对鸦片深恶痛绝，他在1918年担任湘西镇守使的时候就曾禁止鸦片。1921年他出任陕西督军后，也曾实行禁烟政策。1925年西北边防督办之后，实行过分期禁烟，并且鼓励农民种植粮食及其他经济作物，以减少罂粟种植。1927年，冯玉祥在陕西曾下令，军政人员如有吸食鸦片者，一律枪毙；1928年又下令，凡是有种植罂粟的，一经发现，不仅烟田要充公，县长也要枪毙。

当然，由于是战争年代，冯玉祥的禁烟措施并没有取得太好的效果。



军阀吴佩孚对鸦片也持反对态度，曾经下令禁种。1924河南曾经有过普遍铲除罌粟田的行动，使毒品蔓延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自1925年10月出任“讨逆联军总司令”后，因财政拮据，又曾对鸦片开禁。

军阀阎锡山对鸦片的禁止比较有成效，在他统治山西的时期，大力禁止鸦片。在20年代，全省105个县均成立了拒毒会，还设有烟民习艺所、烟民调解所、戒烟善后所、戒烟会和感化所，山西曾为禁烟模范省。但在1926年以后，由于日本人向山西贩运鸦片的加剧及山西财政困难，烟毒又重新泛滥。



八十七 国民党政权初期的禁烟政策是什么？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中华国民拒毒会即发表宣言，代表民众提出8项主张，请求政府禁烟，要求政府严禁外国毒品的进口，训令各省官员禁止种植罌粟，禁绝贩卖鸦片。在民众的呼吁声中，国民政府决定在财政部下设禁烟处，由李基鸿任处长。财政部于1927年9月颁布《禁烟暂行章程》，公布自1928年起限3年内鸦片烟在全国完全禁绝。但其颁布的禁烟办法意为实行鸦片公卖，得此政策，各地禁烟机关乃借寓禁于征之名义，变相纵毒，这种做法实与旧军阀之做法无异，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

在民众的压力下，国民政府于1927年11月、1928年4月，两次修正了禁烟条例，其内容与禁烟暂行章程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为配合禁烟条例的实施，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禁烟行政条例，如《各省检查烟苗局章程》、《戒烟药料护运章程》、《财政部征收戒烟药料特税章程》、《禁烟官吏奖惩条例》、《审理烟案简易程序》、《戒烟药料印花领用章程》等等，坚持鸦片公卖政策。

1928年，全国局势趋于稳定，国民政府禁烟政策开始严厉起来，蒋介石也在禁烟会议上发表慷慨激昂之演说：“如果大家要救国，必自禁烟始”。国民政府首先在新颁布的《刑法》中，加重了对鸦片罪的处罚规定。

1928年7月，国民政府召开常会第79次会议，提出厉行禁烟，讨论彻底禁绝鸦片毒品的办法，拟召开全国禁烟会议，会议决议案呈由国民政府，核交禁烟委员会执行，会上通过了全国禁烟会议组织条例。

1928年8月，禁烟委员会正式成立，张之江任主席，蒋介石、李宗仁、李济深、冯玉祥、蔡元培等许多国民党要员担任禁烟委员。



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



禁烟委员会成员：（左起）主席张之江、委员李宗仁、李济深、蔡元培

八十八 国民党政府的“两年禁毒、六年禁烟”是怎么回事？

1935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颁行关于禁毒禁烟施行办法，针对毒品泛滥的状况，提出“两年禁毒、六年禁烟”的计划，规定1935年至1936年底为禁绝烈性毒品之期限。



1934年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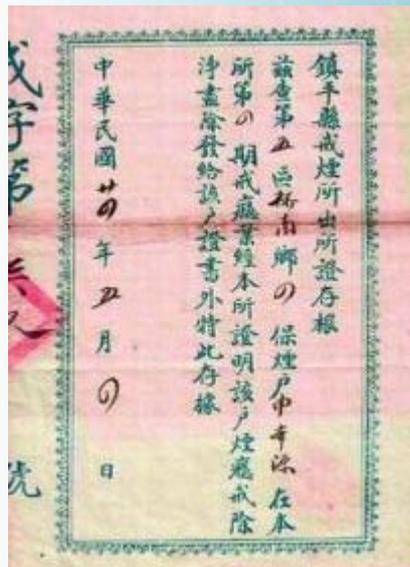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各界5万人的集会上发表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说，认为提高国民知识道德应从衣食住行四项基本生活开始，其中禁烟、禁赌、禁娼是新生活运动的重要内容，因此，禁烟运动与新生活运动一起推展开来。

1935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禁毒实施办法》与《禁烟实施办法》，开始实施“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6月，裁撤禁烟委员会，设禁烟总监，办理全国禁烟事宜。禁烟总监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兼任。

1936年6月公布的《禁毒治罪暂行条例》规定：制造、运输、贩卖毒品者，意图营利为人施打吗啡、或以馆舍供人吸

用毒品者均处死刑。在1935年内，施打吗啡或吸用毒品者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限期交医勒令戒绝。自愿投戒戒绝后再吸用毒品者，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再犯者处死刑。在1936年内，施打吗啡或吸用毒品者，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再犯者处死刑。自1937年起，无论制运售吸毒品，均处死刑。要求各省对吸烟者进行烟民登记，限期6个月办理完毕，并限期勒戒，至1940年底以前戒绝。1935年10月制订《禁烟治罪暂行条例》。禁烟禁毒治罪暂行条例的颁布，取代了刑法第二十章的鸦片罪，原有的禁烟法也不再适用。1935年5月决定废止禁烟法。

在此期间还颁布了《禁烟禁毒考成规则》、《禁烟调验规则》、《公务员调验规则》、《禁烟总会及各省禁烟委员会组织规程》、《禁烟禁毒实施规程》、《戒烟医院章



民国24年（1935年），戒毒所出具的成功戒毒的证明存根

程》、《禁烟罚金充奖规则》、《特许商人采办烟土暂行规则》、《特许设立土膏行店暂行规则》等法规。

为配合“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的实施，国民政府调整了禁烟组织机构，形成了以禁烟总监为核心，下设军事委员会禁烟总会、行营禁烟督察处、各省市府民政厅、警察厅、各省市禁烟特派员等机构的禁烟组织系统。它有很浓的军事色彩，有人称此六年禁烟为“军事拒毒时期”，两年禁毒至1936年12月31日期满。

此次禁烟采取渐禁的方法，分期分批地进行，比较符合中国实际，切实可行，故而取得较好的成效，从而使“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成为中国禁烟史上一个重要时期。

禁种：1935年时，绝对禁烟省份已有豫、鄂、皖、赣、苏、浙、闽、冀、鲁、晋宣布完全禁种，到1938年，17个绝种省份基本实现禁种。

禁运：主要以查缉私运为主。

禁吸：达到全国禁吸烟毒，禁烟计划才有望彻底成功。国民政府对禁吸工作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通过烟毒危害教育与各种自愿、强制的戒烟方法，吸食烟毒的人数有了较大幅度的减少，人们的观念意识有了很大的改观，社会逐渐视吸食烟毒为不齿，社会风气随之有所好转。国民政府及各省市地方政府的工作还是较为认真的，并取得了不小的成效，百年烟毒受到了有效的扼制。



戒烟广告

八十九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禁烟政策是什么？

“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开始，六年禁烟运动虽没有中止，但遇到了极大的压力。1938年2月，蒋介石发表声明，解除自己兼禁烟总监的职务，禁烟总监撤销，军事委员会禁烟总会改隶内政部，负责禁种、禁吸事务；禁烟督察处改隶财政部，负责禁运、禁售事务，各省的禁烟特派员一律裁撤。禁烟行政机构的调整，适应了战时的形势，将有利于禁烟禁毒运动的继续进行。

由于日军在沦陷区实施毒化政策，战前禁种颇见成效的地区，一旦陷入敌掌，即刻毒卉遍地，烟土充斥。为确保六年禁烟计划不至于在最后关头夭折，国民政府于1938年—1940年先后补充制订或修改了一些禁烟禁毒的法规条例。补充制订的有：《各省市领照烟民分期戒绝实施办法》、《各省市筹办强民工厂办法》、《肃清私存烟土办法大纲》、《二十八年查禁种烟办法五项》等；另有修正的禁烟、禁毒治罪暂行条例、特许商人采办烟土暂行规则等。努力从事于禁止种、吸、售、运等工作。

1940年12月31日，蒋介石通电全国，“六年禁烟计划，至本年底期满，并据各省市府报告，全国各地，均已于本年内先后提前禁绝，即最迟者，亦仅至九月底为止……”。六年禁烟中，国民党政府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中国禁烟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八一三”时南京市民欢送中国军队出征

九十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有哪些禁烟措施？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修正了一些法规，增订了一些新办法。修正的法规有三种：1945年行政院的《肃清烟毒善后办法》、1946年2月行政院的《肃清华侨烟毒办法》和8月国民政府的《禁烟禁毒治罪条例》。新订的办法有9种，主要的有：1945年行政院公布的《收复地区肃清烟毒办法》，1946年的《举发烟毒案件给奖办法》、《禁烟考核奖惩规则》、《各省市县设置肃清烟毒调验所办法》、《收复地区戒烟院所设置办法》、《收复地区公私医院诊所办理戒烟调验监督规则》、《收复地区各省市监制戒烟药剂管理配发办法》及《收复地区办理烟民施戒及善后救济事务实施办法》等。

为实行战后两年彻底肃清烟毒的目标，国民政府的有关部门也采用了有力的办法和措施，归纳如下：

- 第一，加强查禁工作。
- 第二，处理缉获烟毒。
- 第三，扩大禁烟宣传。
- 第四，划分禁烟督导区。
- 第五，推行禁烟联保连坐。
- 第六，办理收复区烟民施戒及善后救济事务。

除上述各项之外，国民政府在推行两年断禁政策期间，还对被日本毒化甚深的台湾和东北地区，作出了有别于内地的要求。



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上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签字



1946年6月西康省康属烟毒检查专员查获的一批烟毒人犯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禁烟戏，基本上是在头二年唱的。这两年，它修正或新订的一系列法规，涉及面广，措施严峻；它也开展了一些具体活动，特别是扩大了宣传，这些对禁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当国民党蒋介石公然挑起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后，禁烟政策就完全是个摆设了。

1946年11、12月间，联合国禁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美国纽约举行，国民党政府代表刘晋暄等出席。图为会场外景。



九十一 共产党早期的禁烟活动有哪些？

早在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时候，红军的打土豪分田地，取消一切苛捐杂税里，就包括大烟税。1928年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权，就宣布禁止吸食鸦片，并且同时禁止种植、贩卖毒品。宣布“经二次警告而不改者”，“处决”。（《平江革命历史文献资料集》）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



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的合影



在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时的彭德怀

1929年，邓小平、韦拔群、张云逸、等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建立了红色政权。在韦拔群占领东兰县城后发布的《最低纲领》中，就规定“严禁烟赌”。



百色起义时的邓小平 邓小平（即邓斌）及张云逸签署的布告

在长征中，红军注意对俘虏的军阀部队中有鸦片瘾士兵的改造教育，在著名的遵义会议后发布的缩编令中，注意到俘虏兵的烟瘾问题，要求对没有完全戒除烟瘾的士兵，暂不编入战斗连队。

在贵州，由于当地普遍吸食鸦片，因此要求新兵逐步戒烟，但要求在新兵连逐步戒除，戒除后再正式入伍。

红三军在湘鄂川黔边特区，开展禁烟。同时，革命政府注意禁烟的方式方法，尽量不采取强迫的方式。1934年特区革命委员会颁布的乡政权的纲领性文件《乡苏维埃》里，强调反对强迫戒烟。

1933年，红军川陕根据地颁布的《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中规定：区、乡两级苏维埃政府设立劳工内务委员，职责是“注意卫生防疫和戒烟工作”。（《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集》）

省政府还设立禁烟局，命令禁止种植罂粟，禁止吸食鸦片。



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战士



湘鄂西的第一个革命政权——桑植苏维埃政府

九十二 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禁烟政策、措施是什么？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采取了各种措施禁毒，颁布了各种法律法规防止毒品泛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939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关于解决河北问题的八大纲领》中明确提出，必须“禁绝毒品，限制奢侈品的输入”。

陕甘宁边区颁布了《禁烟禁毒条例》，又于1942年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陕甘宁边区成立了禁烟督察处，在各县建立禁烟督察分处。

晋察冀边区成立禁烟督察局，新四军在淮南的抗日根据地设立禁烟局。

各根据地的禁烟措施主要是：

1，严禁种植罂粟

由于历史原因，一些根据地的民众有种植罂粟的传统。晋察冀边区政府于1939年颁布法令，要求各县政府“认真查禁，彻底肃清，倘有偷种，一经查获，即按中央禁烟治罪暂行条例严肃处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严禁播种罂粟的命令》）

2，严禁制造毒品，严惩制毒贩毒犯罪人员

《晋察冀边区毒品治罪暂行条例》规定：“制造毒品者，处死刑，没收其财产全部或一部”。

晋西北根据地在《禁烟治罪暂行条例》中规定：贩运毒品者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数量在200两以上者处死刑。军政人员犯法，加倍处罚。

3，稽查毒品

在苏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坚决禁止毒品输入。在浙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毒品被列为禁运物品，一经查获，将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同时，在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都有举报奖励制度，群众检举揭发贩卖毒品的，都可以获得物质奖励。

4，禁止或者限制吸食鸦片，限期戒毒

晋察冀边区规定：

凡吸毒者必须于1941年9月1日到村公所登记，凡25岁以下者，限3个月内戒除；25岁—40岁者，限6个月内戒除；40岁以上者，限9个月戒除。限期内未能戒除者，处以劳役和罚款，如再吸食达三次以上者，处死刑。

晋西北边区规定：吸毒者须在一年内戒除，戒烟期间须向政府购买戒毒药品。



毛泽东在延安



周恩来在延安



晋西北根据地军政首长



边区群众踊跃报参加八路军

九十三 解放战争期间我党有哪些禁毒政策、措施？

抗战结束后，我党在东北解放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禁毒运动，在各省市区县都成立了专门的禁烟机构，如禁烟总局、禁烟局。东北人民根据地的辽吉区于1946年8月25日公布了《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与《禁烟禁毒条例》两个重要文件，详细地规定了对贩运、吸毒的惩治措施。

对种植鸦片，制造海洛因、吗啡等烈性麻醉制剂，以及贩运鸦片五百两以上者均处以死刑；对贩运与供应烈性毒品者，处以无期或死刑。《条例》对打击当时新解放区严重的烟毒犯罪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北地区的禁烟运动取得空前成果，使十万烟民戒除了毒瘾，为其他解放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华东解放区也积极开展禁烟禁毒运动，苏北区行政公署颁布了《禁烟禁毒暂行办法》，并向各区派出了工作队，在烟毒严重泛滥的地区设立戒烟所。



九十四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毒品泛滥的形势是怎样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种植、贩运、吸食烟毒的活动，仍有蔓延之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曾推行过烟土公卖、寓禁于征等政策，一些地方军阀视“特税”（即鸦片税）为禁脔，在其所统治的地区，强迫农民种烟，他们象收租一样，年年向百姓公开勒索。因此，全国解放后，在一些有种烟历史的地区，烟地面积仍占相当大的比例。据统计，云南省的烟地占耕地面积的20—30%；西康省的烟地，占耕地面积高达48%以上；贵州的安顺，几乎无户不种烟，习水县八个区，因普遍种烟，被称为“烟乡毒地”。西南全区种烟土地曾达到1545万余市亩，如以每亩约产粗粮230市斤计算，则减产粮食在35亿斤以上（西南区禁烟禁毒委员会：



《西南区一九五零年禁烟禁毒工作总结》，1951年3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

因烟多粮少，人民的生计十分困难，甚至时有饥荒出现。1950年春，西康及川南部分地区，曾因种烟过多，缺乏粮食，造成严重的灾荒。（西南区禁烟禁毒委员会：《西南区一九五零年禁烟禁毒工作总结》，1951年3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

当时，贩卖、制造毒品的活动，也相当猖獗，几乎遍及全国。东北区几个大城市，特别是中朝边境的十个县镇，热河、松江、龙江过去的产毒地带，和铁路沿线的55个县城，从事制造、贩运的毒贩，约1万余人，其中，吉林一地就有600多名。据统计，华北的察哈尔、山西、绥远、河北四省及京津两市，有毒贩1万余人。华东的福建、皖北、苏南、苏北、上海等地，有毒贩3000多人。华中的武汉，是旧中国三大烟毒运销中心之一，所谓吃“黑饭”（即烟毒行业）的行商户和从业人员及其资本，均超过粮食业，毒贩近4000人。如大毒贩王子骥，从1950年1月到1951年6月，先后5次由昆明、重庆等地，用汽车、轮船贩运毒品来武汉出售，总数折合鸦片达60余万两。其活动范围、贩运线路、推销网络，遍及上海、重庆、昆明、西安、兰州、衡阳、广州等各大城市。贵州全省曾出现过“无商不烟”的局面，各地的城乡烟贩，成帮结伙，大肆贩运，牟取暴利。镇远县濂阳镇，是一个仅有1万余





人的小镇，就有毒贩500多人，占人口总数的5%。而贵阳、安顺、遵义、铜仁则是烟毒集散地，终年烟商云集。西北的古城西安，原是西北制贩毒品的中心，一些药房诊所、客栈旅社、手工百货等业，几乎行行贩毒。有些地区，烟馆林立，“生意”兴隆，如昆明一市即有1100多家，贵阳有1000多家，成都有700多家，重庆有270多家，川北的广元城区，每一杂院即有两三户小烟馆。此外，西南各地还有流动的篋篋烟馆（西南区禁烟禁毒委员会：《西南区一九五零年禁烟禁毒工作总结》，1951年3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至于吸食鸦片等毒品的烟民，据初步统计，全国约有2000万人，占当时总人口的4.4%。西南区约

有烟民600余万，占总人口的8%强。云南一省吸烟者占总人口的1/4。贵州全省共有1400万人，其中吸毒者有300多万，占人口总数的21.42%。众多的烟民，不事生产，终日吞云吐雾，晨昏颠倒，形体枯槁，甚至道德沦丧，为吸毒不惜倾家荡产，卖儿鬻女，进而流为盗匪、娼妓，为害社会。当时流传在武汉地区一副对联：“竹枪一枝，打得妻离子散，未闻炮声震地。铜灯半盏，烧尽田地房廊，不见烟火冲天。”这是武汉地区解放前后烟毒危害的生动写照。

其次，严重的是残留在大陆的一些反革命分子，疯狂地进行罪恶的制毒、贩毒活动，藉以拼凑反革命经费，负隅顽抗，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一些大毒犯，都是历史性的职业犯，而且大多具有反动的政治背景。比如，特务陈荣辉于1949年12月潜来南京，组织“苏鲁皖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五纵队”，曾连续三次由安徽明光贩卖烟土来宁出售，充作反革命活动的经费。又如，南京的反革命首犯肖明山，于1950年3月，串通一些原国民党的警察、特务，策划组织反革命武装，妄图响应“国军登陆”。同年5月，肖指派其同伙去江北贩运鸦片和海洛因来宁卖出，所获巨款作为这批特务匪徒的活动费用。以上材料说明，贩卖毒品是解放初期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



再次，烟毒的蔓延，毒化了我党政干部队伍，成为一些公务人员腐化变质的触媒。解放初期，有些革命干部不顾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多次告诫，居功自傲，丧失警惕，不能抵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思想的侵蚀，逐渐蜕化变质，甚至堕落为人民的罪人。在一些违法乱纪的党员和干部中，相当部分与烟毒有关。

建国初期，曾发生了震惊全国全党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巨款案。刘青山参加过高阳、蠡县的农民暴动，被敌人逮捕后，在严刑逼供下，丝毫没有屈服。而进城后，却吸食毒品，借口有病长期休养，实则被海洛因所困。他与张子善合谋侵吞救灾粮、治河款等，挥霍浪费，腐化无度，与吸毒不无关系（1951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



特别是吉林省的蛟河县，由于县委书记殷子华、县团委书记崔晓光，与一名毒犯合伙贩毒牟利，从而诱使该县的主要领导干部包括公安局长、税务局长、县委组织部长等，沆瀣一气，成为一个令人发指的贪污集团（1952年3月1日《东北日报》）。烟毒竟然摧毁了共产党的整个县委组织，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事实！此外，在铁路沿线、航运系统，有少

数职工也卷入贩毒活动。上述情况表明，烟毒的蔓延在政治上、经济上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因此，在建国之初，党中央和政务院十分重视禁毒工作，把禁绝烟毒作为当时社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以最大的决心动员组织群众，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史无前例的禁毒运动。

九十五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有哪些政策措施禁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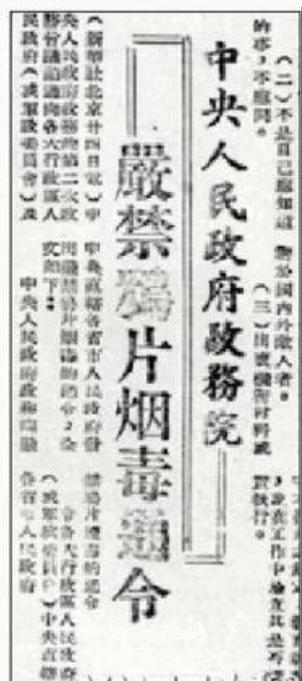
由于烟毒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涉及面较广、政策性很强的历史遗留问题，因而党和政府对禁绝烟毒的态度是坚决的，部署是周密的。从全国范围来看，大体采取了以下的措施和步骤。



首先，发布禁毒通令，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向全国下达了《严禁鸦片毒品》的通令。通令首先指出，禁毒斗争是进一步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的流毒和影响的斗争。中国深受鸦片烟毒的危害，为了保护人民的健康，恢复并发展生产，必须严厉禁绝。通令强调，必须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毒的宣传教育，调动并依靠群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动员人民起来一致行动，彻底根除烟毒。其次，为了加强对禁毒运动的领导，通令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禁烟禁毒委员会，由民政、公安部门及各人民团体派员组成，以便从组织上保证禁毒工作的进行。再次，通令规定了禁毒的政策和措施，指出对制造、贩运、销售烟毒的毒贩和众多吸食者，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

要求各级政府严厉查禁种植鸦片，宣布从通令颁布之日起，凡继续贩运、制造和销售毒品者，要“从严治罪”。对“散存于民间之烟土毒品”，限期交出，“为照顾其生活，得分别酌予补偿，”但如逾期不交，则按其情节轻重，“分别治罪”。要求吸毒烟民，限期向有关部门登记，并定期戒除，如隐不登记，或逾期犹未戒除者，则“予以处罚”。对军事已结束的地区和尚未完全结束的地区，要区别对待。对汉族聚居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也要区别对待。通令还要求各级卫生机关，配制戒烟药，宣传、推广有效的戒烟药方，帮助烟民戒烟；对贫苦烟民，可“免费或减价医治”；在烟毒较盛的城市，设立戒烟所（1950年2月25日《人民日报》）。

政务院的禁毒通令，全面阐明了党和政府关于禁绝烟毒的意义、目的、方针和政策，获得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同时，也解除了众多烟民的疑虑，减少了禁毒的阻力，指导了全国禁毒运动的顺利开展，对迅速根绝烟患具有重大意义。



接着，1951年2月6日，周恩来总理向各行政区的各级政府，重申了禁绝烟毒的命令。严格规定：所有机关、部队、团体，均不得在国内外买卖毒品，违者受国家法令处分，对于旧存毒品，一律无偿地上交当地财委保管，不得隐瞒不交，违者受国家纪律处分。如因零星分散，不便集中保管，可由当地人民政府指定监察焚毁。同时指出，政府和部队的卫生机关，使用鸦片作制药原料者，须编造预算，经中央财政部批准施行。周总理的这一命令，堵塞了机关团体和部队毒品管理不严的漏洞，这在当时也是极为重要的措施。

在党的禁毒政策的感召下，不少毒贩和烟民，开始改业和戒除，禁毒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开展起来。

禁毒斗争和各项社会改革运动相结合由于禁绝烟毒是一场极其复杂、涉及面较广的斗争，因而不可能孤立进行。在1950年到1952年期间，党和政府使禁毒和其他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密切结合，从而收到了相互推动之效。

在种烟较多的农村，各级政府通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以



及土地改革运动，向群众深入宣传禁绝烟毒的意义，并着重进行了积极分子的工作，使禁种收到较大成效。一些地区的农民，自动不种甚至铲除了已种的烟苗。比如，云南嵩明县民权乡的农民，主动订立公约，保证不使一粒烟籽入土，将烟地统统改种农作物。川南的雷波县，是彝族聚居区。当地政府一面耐心地向群众进行反毒教育；一面无偿借给该县种烟彝民93万斤稻谷，解决了改种粮食的种籽困难。于是，彝民不仅主动铲除了烟田，还在雷波县代表会议上作出决议，绝不再种植鸦

片，将烟田改种粮食（《西南区一九五零年禁烟禁毒工作总结》，1951年3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到1951年3月，西南多数地区的烟田，已基本铲除。

在旧中国，妓院是罪恶的渊藪，与烟毒有不解之缘。全国解放后，一些毒贩混迹于嫖客之中，把妓院作为逃避惩处的避风港。1949年底到1950年初，人民政府毅然决定封闭全部妓院，解放受害妇女，一举铲除了极其野蛮、极其残酷的妓院制度。取缔



妓院，对毒贩是一次沉重打击。接着，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又随之清除了一批兼有反革命身份的毒犯。如西安的大毒贩丹青，曾任汪伪山西陵川县及解县警察局长、国民党某部游击第三支队参议。他从1948年起，以开设牛奶场为名，组织贩毒，活动区域遍及北京、上海、洛阳、开封、兰州、武汉等地。在解放后的两年间，丹青贩卖海洛因即达2000两以上。又如南京的大毒贩谷朝选，从1928年开始，即依附青帮头子贩卖毒品，其家被称为“门东毒窑”。谷又与日本领事馆、宪兵队

等一帮汉奸、特务组成贩毒集团。解放后，继续进行罪恶的制毒贩毒勾当。诸如丹青、谷朝选这样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兼大毒犯，在镇反运动中，都受到了人民政府的严惩。

1950年，在各项社会改革运动中，仅在北京、天津等6大城市破获的烟毒案，就达8156起之多（罗瑞卿：《一年来人民公安工作的成就和今后的任务》，1951年1月1日《人民日报》）。

在1952年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各地又先后破获了一批与走私贩毒有



关的大案、要案。如在五反运动中，揭发出的武汉大资本家贺衡夫，利用人民代表、市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等身份，组织并领导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盗窃集团，除盗窃其他物资，盗运巨额黄金出口外，还贩卖大宗吗啡、海洛因等毒品，坑害国家和人民（1952年4月7日《人民日报》）。

当时，广州的毒品走私集团十分猖獗，他们以香港、澳门为根据地，以广州为转运站，从水陆两线进行罪恶活动。在陆路方面，多利用广州、深圳铁路路线进行毒品走私。据统计，从全国解放到1952

年初，活动在该线上的大走私集团不下15个，走私进口货物中，包括大量吗啡、鸦片约在4000两以上。在水路方面，他们利用渔船和机帆船，从港澳将毒品偷运到广东沿海各地，然后汇集到广州和江门，再转运至全国（1952年4月13日《人民日报》）。

此外，上海、武汉等口岸的走私活动也相当惊人。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对这些毒品走私集团，进行了严厉打击，毒品贩子一一落入法网。由于海关缉私人员的努力，基本上控制住了沿海地区的走私贩毒活动。

如上所述，结合各项社会改革运动，既在内地禁绝了种烟，又在沿海口岸控制了走私贩毒活动，这样就为彻底禁绝烟毒，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九十六 新中国成立后的禁烟高潮在哪一年，情况如何？

新中国成立后禁毒高潮的掀起，在1952年春夏之交。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在经过充分准备后，集中力量、集中时间，在全国范围内领导、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禁毒运动，把禁绝烟毒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195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强调指出，为了彻底禁绝烟毒，“在全国范围内有重点地大张旗鼓地发动一次群众性的运动，来一次集中的彻底的扫除，是十分需要的”。《指示》对禁毒运动的方针、政策、打击的重点，都作了明确的规定。5月21日，政务院又发布了《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在三反、五反所造成的有利条件下，有重点地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反毒运动，粉碎制毒、贩毒的犯罪分子及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以根除这种旧社会的恶劣遗毒”。同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禁毒的宣传指示》，强调指出，为了使群众充分了解禁毒的意义，动员他们积极地与贩毒、制毒的罪恶活动作斗争，协助政府检举毒贩，以达到根绝烟毒的目的，必须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强有力的宣传。明确指出，在这次禁毒运动中，打击的重点是制毒、贩毒的主犯、惯犯、现行犯（系指1950年1月以后从事制毒、贩毒者，以前的称历史毒犯）和具有反革命身份的毒犯，以及严重违法的工作人员。

这场禁毒运动的显著特点是，依据中央的要求，深入广泛地发动了群众，组成了浩浩荡荡的反毒群众队伍。当时，全国各地的各级政府，组织大批干部深入群众，宣讲党和政府关于禁毒的方针、政策，以及禁毒的意义。如1952年8月中旬以后，南京召开各种群众会8847次，听众74万余人，占南京人口总数的85%以上。贵州省召开的群众会、对毒犯的控诉会、公审会、毒犯家属会，以及其他形式的宣传活动共1.7万多次，参加会议和受教育的群众达50余万人。北京从8月16日到26日，十天之内，全市召开的各种类型的大、小群众会1.1万多次，对52万市民进行了宣传，基本上做到了家喻户晓（《关于禁毒宣传的情况和初步经验》，1952年8月30日）。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运动中，全国各省共召开各种形式的宣传会达76万多次，受教育的群众有7459万余人之多。

广大群众了解了禁毒的意义和自己的责任后，积极行动起来，协助政府开展禁毒斗争。北京在十天之内，就收到群众检举毒犯的材料3万多件（《关于禁毒宣传的情况和初步经验》，1952年8月30日）；南京在运动中收到的检举信有5万多封。据统计，全国共收到群众揭发毒犯的材料共131万多件，检举的毒犯有22万余人。

有的群众主动监视毒贩的活动，及时向政府反映；有的协助政府查证材料；有的当面控诉并揭发毒犯的罪行。还涌现出许多妻子检举丈夫，子女劝导父母，弟妹动员哥嫂交待罪行的生动事例。群众的广泛发动，形成极大的威慑力量，使毒犯终日惴惴不安。特别是有的省市通过召开万人以上的大会，对坦白彻底、检举立功的毒犯，当场予以释放；对罪行严重、抗拒登记的则予以逮捕，并当场焚毁收缴的毒品。这样，进一步具体、全面地交代了政策，体现了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精神，表示了政府禁毒的决心，收到了很大的效果。群众激动地说：“空口说话不如现身说法，现身说法不如当场执法。”而毒犯则惊恐万状，纷纷向公安机关主动登记、坦白悔过。比如，南京在运动中报到登记的毒犯，占全市毒犯总数的82.3%；北京在十天内坦白登记的毒犯有1000多人（《关于禁毒宣传的情况和初步经验》，1952年8月30日）。武汉在一个时期里，坦白的毒犯达3000人。据统计，在这场禁毒运动中，全国坦白登记的毒犯，约有34万多人。

这场禁毒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党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正确政策，保证了禁毒斗争的顺利发展。根据当时的情况，中央明确指出，要以制造、贩运的毒犯为打击重点。具体政策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小犯、偶犯、从犯从宽，大犯、主犯、惯犯从严。总的精神是严查宽办，惩治与教育相结合，以争取改造大多数。这样就争取了协从、偶犯和毒犯家属，以及为数众多的吸毒烟民。在定案处理的过程中，也体现了区别对待的政策。从全国来说，处决的少数大毒犯，一般是具有反革命身份而且民愤极大的分子。对逮捕的毒犯，大多通过管制或劳动改造，使他们改恶从善，重新做人。

九十七 新中国成立初期毒灾最重的云南省是怎样禁毒成功的？

1950年2月，周恩来总理签发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的通令，要求各级政府要进行广泛的禁烟宣传，组织专项讨论，拟定限期禁绝的措施。在军事斗争结束的地区，立即进行禁烟工作；在尚未结束的地区，一俟结束，便着手解决；在少数民族地区，则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慎重态度，有步骤地实施禁烟。随后，西南军政委员会也发出开展禁烟工作的指示，要求云南将此作为政府的重要任务加以对待。



西南军政委员会先后颁发了《西南区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和《西南区禁绝鸦片烟毒治罪暂行条例》等法规，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禁烟的办法，明确了惩治的范围、界限及量刑标准，将禁烟运动置于法治化的基础上。6月，滇省形势初定，云南省人民政府立即颁发禁烟禁毒布告，宣布：“自布告之日起，严禁种植鸦片以根本消灭烟毒来源，严禁贩运或制造烟毒，严禁机关部队工作人员包庇收受烟土，并切实取缔烟馆，限期转业。违者不论何人，除没收其烟土毒品外，均须从严治罪，以肃清烟毒之流布。对于吸食烟毒的人，则须广为教育规劝，使其自动戒绝，彼此监视，永不再犯”。从此，云南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禁烟运动。概括而言，云南禁烟的主要措施有：

1、明确禁烟工作的方针和重点。针对云南地方鸦片种吸时间长、范围广、影响深的特点，政府采取“严厉惩办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实施集体并大量贩卖者从严，个别并少量贩卖者从宽；主犯从严，从犯从宽；惯犯从严，偶犯从宽；反革命毒犯从严，一般毒犯从宽；拒不坦白者从严，彻底坦白者从宽；过去从宽，今后从严的处置办法，从重从快惩处极少数，教育改造绝大多数。同时，借助各种舆论工具，大造禁烟声势，配合严厉的打击行动，形成浓郁的禁烟气氛，收实效于无形压力之中。在具体方式上，区别对待，重在禁种、禁运和禁售，教育和规劝吸食者。

在禁种方面，实施领导督促、群众监督和作物替代相结合。各级政府积极领导，宣传政策，教育民众自觉不种；群众间相互监督，相互检举，与领导监督相结合，形成严密的监控网；同时，积极发展生产，改种粮食或其他经济作物，实施作物替代。禁运方面，各

级政府发动群众，广泛布控，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缉捕活动；严禁公职人员或机构包庇私受或征收烟税，纵容偷运行为。禁售方面，取缔各类烟馆，限期转向，从事正当经营。禁吸方面，从禁止机关及部队人员吸食鸦片入手，作出表率。接着，将多数瘾民组织起来，借助座谈会、讨论会等形式，教育引导，提高觉悟；开展一帮一活动，彼此监督，以及家庭成员的苦心规劝，引导瘾民自动戒烟。

2、建立健全禁烟机构，发挥领导作用，将禁烟任务落实到基层。1950年9月，云南省禁烟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宣布成立；12月初，禁烟委员会正式成立，领导全省的禁烟工作。接着，各专区、各县分别成立禁烟委员会；部分区、乡、村也成立起禁烟小组。在云南省禁烟实施办法公布后，各级禁烟机构也结合地方实际，制定相关计划，采取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广泛发动群众，将禁烟任务落实到基层，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在建立健全各级禁烟机构的同时，云南省积极抓好干部的工作。除严禁公职人员收受烟土和吸食鸦片，保持自身的纯洁外，还配合禁烟通令的传达，教育各级干部形成共识，了解政府禁烟行动的决心、重点和步骤，掌握政策；通过干部的领导作用，督促群



众积极行动，落实禁烟的各项要求。

3、依靠各类团体，发动广大民众，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禁烟运动。在禁烟法令颁布之初，人民政府便依靠各类群众团体，积极开展工作，促使群众自觉行动。如省农民协会向全省农民发出拥护禁烟法令彻底禁绝烟毒的号召，要求各级农代会召开大会，专题讨论禁烟工作，制定切实有效的办法，保证不让一粒烟籽入土；农协成员要积极参与禁烟工作，起模范带头作用；若有吸食者，要限期戒除；以及负责调查检举破坏禁烟法令，偷种、偷运烟土的不法分子，交当地政府惩治。

与此同时，人代会、农代会、妇代会及青年团体等也采取类似的措施，采取各种方式发动群众，形成合力效应，不能不禁，不得不禁，推动禁烟工作的落实。由于实施这些措施，在较短的时间里，云南禁烟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1951年，除少数地区外，云南大部分地区基本上禁绝了罂粟，落实了全面禁种任务；偷运鸦片行动也得到有效地制止，基本上消除了大宗贩运现象；各地的烟馆全部封闭，农户家庭的陈土得到清理；瘾民们正积极地自觉戒烟断瘾。据不完全材料统计，到1953年底，云南全省收缴烟土等毒品349万两，各类烟具7.74万套，捕获毒犯9000余人，处理3900余人，80%以上的烟民戒断了烟瘾。横行百年之久的鸦片毒瘤，终于得到了有效地控制。



九十八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有没有毒品泛滥，有什么政策法规？

1953年，经过新中国成立后三年多的艰苦努力，我国成功地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了毒品，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无毒国”！

由于种植、制造、贩运、吸食毒品的丑恶现象在我国基本消失，国家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禁毒委员会也失去存在意义，予以撤销。

60年代中期文革以后到70年代末，虽因各种原因，烟毒这一毒症又死灰复燃，在一些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发现了种植毒品原植物和制造、吸食鸦片的情况，但涉及面小，毒情不重。

我国七九《刑法典》仅规定一条，即第171条：对制造、贩卖、运输鸦片、海洛因、吗啡或者其他毒品的，规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罚金。一贯或大量制造、贩卖、运输前款毒品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九十九 改革开放后我国毒品泛滥的情况是怎样的，采取了哪些措施？

自本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事业的逐步深入，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日渐频繁，在引进吸收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大力促进了国民经济飞跃发展的同时，资产阶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腐朽思想乘虚而入。加之一段时间我们教育工作的失误，精神文明建设的滞后，在国际毒品犯罪活动的渗透和诱惑下，国内毒品犯罪迅即沉渣泛起，不断呈上升趋势，出现了50年代禁毒运动后从未有过的严重情况。毒品犯罪，尤其是走私，贩卖毒品的案件迅速增加。

1983~1990年，全国各级法院共受理毒品案件18457件。全国毒品案件1989年上升20.73%，1990年又上升57.77%。据权威机构统计，1991~1995年我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分别是：14.8万、25万、38万和52万。毒祸肆虐似滔天洪流，造成极其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毒化了社会风气，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党和国家80年代初党中央、国务院就接连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坚决查禁毒品，并把打击毒品犯罪始终作为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重点。江泽民同志也强调指出

“现在不把贩毒、吸毒问题解决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涉及中华民族兴亡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

为了适应同毒品犯罪做斗争的形势要求，加强对禁毒工作的领导，1982年，作为我国毒品重灾区 and 反毒前沿的云南成立了省禁毒工作领导小组。由于毒情的日趋扩散蔓延，为加大全国打击毒品犯罪的力度，提高禁毒、防毒、拒毒、反毒的工作成效，1990年11月3日，国务院第72次常务会议决定成立国家禁毒委员会，对内称国家禁毒工作领导小组。

此后各省市、自治区、及地（州）、县（市）各级人民政府也按照中央的统一要求，相继设立地方各级禁毒委员会（即禁毒工作领导小组）。禁毒委员会是各级党委、政府抓禁毒工作的专门领导机构，它担负着打击毒品犯罪，严格执行禁毒法律法规、有关禁毒行政管理、禁毒宣传教育等涉及各个行业、部门的统筹协调工作，保障各项禁毒工作协调有序，富有成效地进行，研究制定开展和加强禁毒工作的重要政策、意见及措施，组织协调禁毒工作重大行动的开展，重要举措的落实。了解各地毒情基本情况、特点和规律。禁毒委员会的成员一般包括公、检、法、司、海关、卫生、医药、工商、民政、财政、农业、林业、化工、文教、工青妇等机关部门组织。禁毒委员会设禁毒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一名，一般由各级人民政府分管禁毒工作的负责人担任。设付组长若干人。



禁毒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作为禁毒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办事机构和依托，负责禁毒委员会日常管理工作和文件政策起草工作。禁毒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在党委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统一领导、协调部署对毒品违法犯罪的预防打击，确定禁毒斗争的方针、目标，开展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集中全社各行业、部门团体、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力量，遏制吸食、制造、贩卖毒品等丑恶现象在我国的迅速



蔓延发挥了积极的巨大作用。

在政策与法律法规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1990年12月颁布的《关于禁毒的决定》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善的规定毒品犯罪的单行法规。在确定的罪名、毒品的种类方面，均履行了国际禁毒公约所约定的国家在禁毒领域所应尽的义务。1997年10月，实施了修订后的刑法，对于毒品犯罪定罪以及量刑进行了完善。200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审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解释》，对于苯丙胺衍生物、杜冷丁、大麻烟、大麻油、大麻脂、可卡因、吗啡、盐酸二氢埃托啡、罂粟壳、罂粟、大麻明确了定罪量刑标准，使得我国在禁毒法律的立法更趋于完善。

一百 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的性质与职能是什么？



禁毒教育集体主展厅外景

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以下简称“禁毒基地”）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领导，隶属于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是面对青少年和普通市民进行禁毒教育的政府公益性事业单位。

1、教育基地：教育基地是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的首要职能，它通过北京市禁毒教育展、禁毒题材的演出和相关影视与多媒体的演示，以及北京禁毒在线网站这三部分实现。

北京禁毒教育展作为禁毒教育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常规手段，既提供了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教育与传播的形式，又构造了促进禁毒教育信息化、规范化、系统化的技术平台，为工作基地和交流培训基地的运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工作基地：工作基地的主要功能是管理和运行各类禁毒教育的组织、机构，同时与媒体和企事业单位合作进行禁毒教育文化项目的运作。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下设的组织机构包括北京市禁毒教育专家咨询委员会、北京市禁毒教育协会、北京市禁毒教育基金和禁毒志愿者奖励基金以及禁毒教育资料库。此外，北京市禁毒志愿者总队的办公地点和培训地点也设在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

北京市禁毒教育专家咨询委员会由相关政府部门、社会组织机构和禁毒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构成，委员会与禁毒



教育资料库相结合，提供了相关专业的科研和咨询服务。

北京市禁毒教育协会旨在动员一切社会力量，特别是企业和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个人，参与全民禁毒斗争，为禁毒教育提供财力物力以及影响力的支持。

北京市禁毒教育基金和志愿者奖励基金旨在支持北京市在禁毒教育领域有重要意义的项目以及表彰和鼓励在禁毒志愿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与组织。

禁毒教育资料库是以禁毒教育展为依托建立起来的与禁毒教育相关的数据、文献、实物、文物等多层次、多径向、多流量的专业资料馆。

北京市禁毒志愿者总队是北京市禁毒志愿者的最高组织机构，主要负责发展和培训禁毒志愿者、组织相关活动，指导志愿者工作，努力扩大禁毒志愿者组织的规模和影响力。



3、交流培训基地：交流的功能主要体现在组织

学术研讨、参与国内和国际的专业交流及活动、以禁毒在线网站为媒介展开网络互动等。基地希望通过广泛地交流在学习和借鉴中不断提升自己。在国内交流方面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已经走在了前面，与国家禁毒办和十几个省禁毒委联合开展了中国禁毒志愿者汽车万里行活动；连续四年组织北京青少年禁毒教育研讨会，邀请全国各禁毒教育基地主要负责人及相关专家学者，全方位探讨青少年禁毒教育的方向、理论及实践问题，该研讨会的理论成果为全国青少年禁毒教育工作提供了持续地、系统地理论参考和成果汇集。

培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和方面：一是对学校的禁毒教育辅导员进行的专业培训，二是对社区禁毒教育工作者开展的职业培训，三是对禁毒志愿者组织内部的骨干进行系统培训和管理培训。

我们将力争把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建设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公益性教育机构，为禁毒社会文化的建设做出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应有的贡献。



“志愿者禁毒汽车万里行”车队



禁毒志愿者